

A portrait of Deng Xiaoping, the Chinese leader, is shown in profile, smiling slightly. He is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jacket.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image is a dramatic, fiery sunset or sunrise in shades of red, orange, and yellow, with a bright sun low on the horizon.

邓小平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电视台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

编 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电 视 台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郑 刚

版面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 华 书 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外文印刷厂

850×1168mm 32开 8.75印张 160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00001—200000册

ISBN 7—5073—0368—3/K·130 定价：16.00元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

序 集

邓小平，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
他在党和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
他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江泽民）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他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18岁那年，他在法国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岁月中，他战功卓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建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中央总书记，他日理万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作出了艰辛的探索。

历经十年浩劫，邓小平走向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开创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通衢大道。

（邓小平）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江泽民）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他的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不仅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的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

邓小平的革命生涯波澜壮阔，又富有传奇色彩。

他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奇迹般地复出。

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

这，就是邓小平，一个真实的故事……

第一集

早年岁月

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他最早的照片。

邓小平 1904 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属龙，他 16 岁离开家乡，至今再没有回去过。

由重庆往北，沿渠江而上，行船约 300 华里，就到了广安。

这里不通火车，在靠船做交通工具的岁月里，广安是很闭塞的。

这条小街宽顶多五米，长不过一华里，是过去广安县城里的主要街道。

邓小平是在县城读的中学，如今那学校的老房子已经不在在了。

记者：老人家，这个房子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老人：这个历史总是百多年了。

记者：这房子过去是于什么的知道吗？

老人：过去呀，过去是个米市，卖米的，现在还是在卖米，还是在卖。

那是个广安的九公祠，那个里头是个火神庙，火神庙。那外面是个南昌宫。

（唱词）金广安，黄白莹莹然，桑麻榆枣丰，沃野无闲田。金广安，庶民百姓，忠介质朴，不畏水旱，抗拒凶顽，名冠天府，点染好家园。

邓小平的老家离广安县城还有七华里，在城北的协兴乡牌坊村。

记者：还有多远呢？孩子们：没多远，就到了，就在前边的树下。天上的宝是太阳，地上的宝是娃子……

当地人都把这里叫做“邓家老院子”。

看房子的模样，邓家在牌坊村算是大户人家。邓小平的父亲叫邓绍昌，民国 3 年时做过县上的团练局长。他的母亲姓淡，是广安县望溪乡人，16 岁嫁到邓家。邓小平是他们的长子。

（陈贤松 邓小平旧居管理人员）

房子一共是 16 间，那个是他的曾祖父以前修的了，那个是他祖父修的，那个是他父亲修的，三代人修成了这么个三合院。解放以后，1950 年，小平在重庆大西南嘛，把家里人就全部接到他们一起去了，1950 年走的。我们这里 1952 年实行土改的。土改的时候小平写了信回来说，他们家里不回来人了，这个房子就分给贫下中农住，所以分了，就分了四户人。四户人一分开，他们就变成了八户人。1987 年的 5 月份，叫往外搬，就把这个屋腾出来供大家来参观。保持它的原状，不使它垮。这里头就是它的堂屋了，现在说就是客厅，以前说就是个正堂屋。原来横着有个供神的神龛，神龛上横着一块匾，一边有四个椅子，两个靠凳，以前就叫拜子台。那是他（邓小平）父亲住的屋，那个是他父亲以前的那个床。

1904 年，农历七月十二日，公历 8 月 22 日，邓小平就出生在这里。

（陈贤松）

这个床，就是他母亲的陪嫁床，小平呢，出生就在这个屋，这个床。小平一直住在这个屋，直到离开家就是住的这个屋。

（陈德玉 邓小平远房堂弟邓先远之妻）

记者：阿婆，你们家这个家谱在邓家家谱里是不是最老的一本？

陈：是嘛！记者：最老的一本，那您拿给我们看看好吗？噢，就这个家谱。邓氏分谱。阿婆你识字吗？

陈：我不识字，我要是识字那些都认得完了。

记者：从这个谱上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一家有记载的是从邓鹤轩开始，也是明代。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是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

家谱里还说，邓家在历史上曾经是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唐宋元明，代有伟人。这些显赫的家世已无从细考。在邓氏家族，邓绍昌这一房不能算人丁兴旺，到邓绍昌这一代已是三代单传。

大概出于望子成龙的愿望，邓绍昌给他的头一个儿子起名：邓先圣。

邓先圣五岁被送进私塾，教书先生说“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欠恭敬，于是给他改名邓希贤。这个名字，他用了18年。

（邓垦 84岁邓小平胞弟）

我母亲是非常爱小平同志。她是那个旧社会的妇女嘛。他（邓小平）是长子。因为我那家里当时困难也很多，父亲长期不在家，虽然也有点土地，我家是个40亩土地，40亩，在我们那里叫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合成亩嘛，大概就是40亩地，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母亲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很困难的。她就很希望小平同志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

协兴乡离牌坊村五华里，这里五天赶一次“场”，平常很冷清。

顺着这条巷子往里走，现在是乡里的一个办事机关，早年是协兴初级小学的所在地。

中国的旧式教育是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开始的。邓希贤在这里读了五年书。他的童年是什么模样呢？传说很多。

（邓垦）

有这样一些故事，都是我妈妈、我姐姐她们讲的。我们那个家乡，有一个姓刘的，是个地主，和我们家和我父亲他们有些来往。那个时候父亲不在家，家里很困难，不是过年过节要写个春联吗？写对子啊。那个地主他有文化，又会写又会画。那时候，就请他写个春联，买了张红纸，请他写个春联。他那个家伙很坏，他就写几句话，挖苦我家里面。我家里面我母亲，我姐姐他们都不识字，不知道啊。他（邓小平）看到了，看到了之后他很生气，把它撕掉，自己又买了几张红纸。他那时还很小啊，自己来写，写个对子贴上去。

从广安到重庆的几百里水路，遥远而又漫长。渠江的水淌了多少年，纤

夫的号子喊了多少年，它记录着这个民族贫苦的历史。

五四运动前后，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些志士仁人倡导的留洋运动达到高潮。法国是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它的影响，很快就遍及全国。

1918年，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在重庆夫子祠开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时，邓小平正在广安读中学。

（邓垦）

我的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写信回来，要他（邓小平）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父亲呢，极力主张，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家里面还有一场争论，最后还是同意他去了。我那时只有几岁嘛，才开始上学。但是他走的那个情节，我知道，家里都集中啊，欢送他嘛，然后他嘛就很简单地走了。行李，那个时候，四川农村里面出个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走了。我那个家离重庆还有二百多华里，还要经过一个合川县。

有了公路，广安的水码头就冷清多了。

1918年的下半年，14岁的邓希贤和他的叔父邓绍圣，还有一名叫胡明德的同乡，一起从这里离开了广安。那时，邓希贤脑子里想的，只是外出学点本事，没有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1926年他的母亲去世时，邓希贤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

1936年他的父亲去世时，他已随长征的队伍到达了陕北。

父亲为儿子选择了留洋的路，以后的路是儿子自己选择的。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为乡下来的学生打开了眼界。在那里读过书的青年，后来有许多人投身了革命，其中除了邓小平，还有聂荣臻。在重庆这段日子里，最使他们难以忘怀的是他们的校长汪云松。这个曾做过清朝四品道台的重庆商会会长，是个热心人。他从筹建学校，到为学生募集资金，办理出国签证，都是亲力亲为。建国后，邓小平曾说：汪云松为共和国培养了两个副总理。

（汪毓莉 汪云松孙女）

解放后，第二天，刚解放第二天，邓小平就叫随军西南的方振华和周新岳两个同志到我们家来了。当时我祖父，不大了解这个情况，没去。过了几天以后，曹荻秋市长亲自到家里来，就告诉他，邓小平已经到西南了，是西南军区的政委，请你去。我祖父当时听了很高兴，就去了。去吃了饭回来以后，祖父就很高兴，经常给我们谈起，就说是共产党是不忘旧情的，只要你给做了好事，是不会忘记的。他讲到这非常地兴奋。后来（党）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原来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也是重庆市人委委员、重庆市人大代表……

1920年8月27日，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83名川东子弟，告别家乡，乘船离开了重庆。邓希贤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沿着这条出川的水道，走出“壶中天地”，眼前是一片从未有过的辽阔。

9月11日，他们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据说，启锚的那天，大雨如注。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远航，异国他乡的风情，海阔天空的景色，给这些年轻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比他们晚两个月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曾这样抒发当时的感受：

“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1920年10月19日，“盎特莱蓬”号在历经39天的海上航行后，终于到达了法国南部城市马赛。

（记者读报）

（《小马赛人报》关于中国留学生抵达的报道）

100名中国青年人，他们的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静悄悄地站在“盎特莱蓬”号的甲板上。

55年后，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邓小平重访法兰西。

德斯坦总统对他说：希望您的这次法国之行能唤起您对法兰西的回忆。

法国，这个他曾经生活了五年多的国家到底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呢？

在巴黎的法国国家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些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档案。

不过要拍到那些档案是不容易的，光办手续我们就用了两个多小时。并非管理人员有意刁难我们，全世界的学者都到这里查档案，万一有些疏漏，20年代的那些纸张恐怕是很难保存到现在的。

（字幕：你们要的资料找到了，这些纸很脆，你们必须小心）

（字幕：巴耶）

到法国不久，邓希贤就和他的叔父邓绍圣一起来到了法国西部诺曼底大区的这座小城，在一所中学补习法语。小城的风光有点像四川的广安。对于只有15000人口的巴耶来说，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中国学生，在当时的确成了新闻。

（米歇尔·莫尔朗 巴耶市民）

我们很惊讶，我们就像这样看着他们。他们比我年纪大，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可能与他们有来往。那时我十几岁，我不知道那时他（邓小平）多大岁数。

是不是18岁？

不，那时邓小平先生16岁。

（字幕：巴耶中学）

（让·伊夫·博菲斯 巴耶中学副校长）

很可能邓小平先生当时在这个走廊上走过，因为这里没变。你看，这里已经很旧了。

（翻译介绍）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死的这个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名单）。

邓小平那时候来的时候，这个牌子肯定还很新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巴耶中学的旧校舍还在使用，副校长让·伊夫·博菲斯先生利用我们到来的机会给学生们上了一堂中国历史课，还启发学生向我们提问。

（记者现场回答法国学生提问）

问：现在还有没有人民公社？

记者：人民公社已经没有了……特别是中国的农村改革，效果特别好，而提倡农村改革的，就是你们巴耶中学的学生邓小平。

其实，邓希贤只在这里读了五个月的书。1921年3月13日，在巴耶中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这是为什么呢？

（记者现场读档案）

1921年3月，邓希贤和邓绍圣以及在法国巴耶中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消费的明细帐。这一栏是他的洗衣费7法郎，这个栏是他租家具的费用，这一栏是学校的一些零散的费用，这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别的开支，这个月他一共开支244.65法郎。

（博菲斯）

我想，他们再也没有中国政府的资助，来维持他们在中学的学业了。

这样一笔开支对自费留学生来讲，是很难负担的。于是，邓希贤等19名中国留学生不得不离开学校，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在一个名叫施奈德的钢铁厂里，邓希贤找到了一份工作。

（施奈德钢铁总厂专家）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921年到1923年之间的克鲁梭与施奈德工厂的全貌，是在飞机上拍的全貌，在这张照片上看到这部分都是轧钢车间。

这项工作还是很艰苦的，要把钢条从这里拉出来，然后拖到另一个地方冷却……

施奈德钢铁总厂是当时法国最大的军工企业。还不满17岁的少年邓希贤，在这里当上了一名轧钢工，工卡里记载，他的报酬是每天6.6个法郎。而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上学了。中国学生的中间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法语“杂工”的谐音）在这里，邓希贤第一次体验到做工的酸辛，体验到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

不久，他辞去了这份工作，离开了克鲁梭。

法兰西不是天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经济萧条，大批的复员军人返乡使得法国国内失业率上升，留法学生所面临的是失学、失业和饥饿。1921年2月，

在赵世炎、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留法学生中爆发了“反饥饿运动”。来到巴黎的邓希贤，这段时间里，到处寻找着工作的机会。1921年10月，因为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手工作坊招收工人，困难到极点的中国学生，一下子就去了一百多人。在那里扎100朵花可以挣两个法郎。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被解雇了。

（加·雷涅夫人 留法勤工俭学史专家）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厂房，那时都不存在。那时只有农场的房子，在停车场的对面，给工人建了一些宿舍，中国工人住的棚子，一定就在那里。

雷涅夫人所说的那些中国工人住的工棚，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夏莱特市的哈金森橡胶厂在法国一直十分著名。

（哈金森工厂老工人）

这个房子一共被烧过两次，原来上面还有一层，最后一次火灾后，就把这一层去掉了，这以后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这间仓库从前是一个制鞋车间。1922年2月，邓希贤在这里当上了一名制鞋工人。在这里他结识了汪泽楷、王若飞、郑超麟等一批当时的先进青年，并和他们同住在一间工棚里。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郑超麟 95岁原留法学生）

在公共宿舍三十几个学生当中呢，他（邓小平）的年龄最小，除了他以外，恐怕都是20岁以上的人了。我们大家都是喜欢他，就是把他当作小孩子，喜欢同他讲话，同他说笑话，同他玩。

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罗尼森林里的这块草地上，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18名中国旅欧学生向一位开咖啡店的老太太租来一些椅子，或就地而坐。“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它和中共旅欧支部成为留法学生和华人开展政治活动的领导核心，一批旅欧的优秀青年聚集在了党团组织的周围。

不久，邓希贤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了一名青年团员。第二年的3月，他离开了哈金森，工卡上注明的原因是“拒绝工作”。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历程。

（邓垦）

他在法国的时候写过信回家，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从事革命活动，不回家了，不能回家了。从事革命活动就不能回家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当然，家里嘛，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很着急的，就盼望他回家来，旧社会嘛，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不能回家了。

70年代，邓小平曾两次到过法国，有一次他还特意去了巴黎意大利广场边上的戈德弗鲁瓦街，对这条小街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他还让身边

的工作人员从小街上的这间咖啡店里买咖啡给他喝。他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当年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住在这里，并经常到这里喝咖啡。

实际上，这个咖啡店的楼上就是当年旅欧党团组织的机关所在地。

1923年夏天，邓希贤在这里加入了旅欧青年团领导机关的工作，成为《赤光》杂志的一名编辑，周恩来就是他的直接领导。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一群年轻的战士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把目标对向了未来。因为工作出色，邓希贤在同志们中间赢得了“油印博士”的称号，翻看《赤光》，仿佛依然散发着油墨的气味。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4年7月，因为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周恩来被调回国内。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20岁的邓希贤当选为执行委员，并进入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局，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6月，他直接参加组织了为支援国内五卅运动而举行的法国华人示威活动。在这份“告示威华人书”里，他写道，一个沉重而光荣的表示在欧洲反动势力的中心巴黎发动了。我们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向帝国主义的政府作直接的示威运动！

此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雷诺汽车厂的一名钳工。

（访法国雷诺汽车厂专家）

现在我们到了钳工车间，有人会给我们开门。

他当时工作过的车间，现在已经成了雷诺汽车厂展览馆的一部分。

专家：这个头需要打磨。

记者：这就是当时邓小平在这儿干活的时候所做的工作。

旅法华人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示威活动，震动了整个欧洲。旅欧中国党团组织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密切注意，从1925年6月起，邓希贤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法国警方的档案里。他们查清了这个叫邓希贤的中国青年住在布罗尼一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3号，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的各种会议上，经常发言。

（翻译读档案）

执行警察局长的命令，今天早晨5时45分至7时，在布罗尼一比扬古尔对下列三家旅馆进行了搜查。这三家旅馆的地址是：特拉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朱勒费里街8号。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

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记者：那么，1926年1月8日以后，还有没有关于邓小平活动的记载？

专家：在这个日期以后，再也没有邓小平在巴黎的记载了。

邓希贤走了。他结束了在法国五年多的生活，在警方采取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和另外 19 名同志一起去了莫斯科。在十月革命的故乡，邓希贤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里较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这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高潮时期。1926 年底，邓希贤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调回国内。在冯玉祥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他担任了政治处长的职务。但不出几个月，形势就发生了变化。1927 年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冯玉祥也把自己部队中的中共党员“礼送出境”。邓希贤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被迫撤离了西安。

1927 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悲壮惨痛的一年。

那年的六七月间，邓希贤辗转到达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工作。为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从此更名邓小平。8 月 7 日，他参加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

（邓小平）

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武昌三道街 1 号、11 号。那个时候政局变化很大，还是在八一以前就定的吧，一部分人去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是叫八七嘛，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

53 年后，邓小平故地重游，谈起那次会议，他的心情极不平静。正是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开展土地革命，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不久，他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了上海。1927 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年他 23 岁。

（郑超麟 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1927 年以后同 1927 年以前情况有不同，中央从武汉搬到上海来，情况变了，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也不许去。

（黄玠然 93 岁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那个时候，中央有一个办公接头的地方。那个地方啊，就是中央政治局在那里开会的，邓小平是秘书长，当然他在那里。

记者：老伯伯，到楼上去是从这儿走吗？

居民：可以走的。

记者：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请您带带路。您今年有多大了？

居民：我今年 81 了。过去我们是从外面走的，从外边弄堂，现在因为弄堂已经开了店了，所以不好走，要走就从我这儿走。

（张义渔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根据我们的考证，这个楼上，是1927年到1931年这段时间里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政治局很多重要会议都在这儿召开的。

（黄玠然）

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周恩来同志解决问题。机关的工作，事务工作，那是要小平同志负责的，两个人不可分离的。

我同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都在那个地方开始认识的。但是我同他的关系呢，仅仅是这样一个工作的关系。可是不能到他家里去的，他也不能到我家里来的，因为凡是负责同志到哪个地方去，可以到哪个地方去，不可以到哪个地方去，都要上面决定的。因为秘密工作，最怕是发生问题以后受到牵连。

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站住脚跟，开展工作，中央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负责干部职业化”。于是，邓小平当过杂货店的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作为中央秘书长，他熟悉所有中央机关的秘密接头地点，熟悉上海的街道弄堂。

（刘英 90岁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央秘书长。他们来经常穿的资本家的缎子袍子，穿的马褂，官僚一样的，经常化装，到什么地方就穿什么。到租界上人家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人家穿工人衣服，所以人家就不容易发现你，不注意，跟群众一样。

这里也曾经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个秘密接头地点，这是它的后门，它的前门开在另一条弄堂里。

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有一次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了。我出门后看见一个扮成擦鞋匠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邓垦）

后来我到上海去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我到了上海就找吧。那儿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也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结果我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个寻人启事，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到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还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地方去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这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之间进来一个人敲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13年了，变化很大，还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我说我就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

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之后他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来求学的。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刘英）

外面牺牲同志很多，同志之间，见了面非常亲切。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潇洒，很风趣的。他看到我，他就叫我，小姑娘，小姑娘，我实际上比他只小一岁，但是我显得小啊。都是年轻人，可是他很老练，所以他知道事情很多。我从湖南来，我许多东西很闭塞。所以，很多事情就问他。那个时候同志关系非常不同，跟一家人一样的。

1928年，24岁的邓小平结婚了，新娘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比他小两岁的同学张锡瑗。

（郑超麟）

我记得是三桌酒，在中央工作的人，无论领导人或者普通工作人员都来了。我了解一下，这个宴会钱是邓小平自己出的。大家吃完之后，好像菜已经完了，大家还有兴趣再吃，邓小平又另外又来叫菜，让大家吃，我心里印象，大概邓小平家里很有钱吧。

在白色恐怖的海滩上，在巡捕森严的租界地里，这是一片纯洁、美丽的人间真情。

据说，这对年轻的夫妇，很长时间里是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在这栋房子里。邓小平、张锡瑗住在楼下，周恩来、邓颖超住在楼上。

邓颖超后来回忆，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

张锡瑗出生于河北良乡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25年参加革命，在她短暂的人生经历里，曾经参加组织了河北保定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她死的时候才24岁，平生只留下了一张照片。

20年代末，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军阀之间的混战从来没有间断过。1929年爆发了蒋桂战争，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决定在混乱的广西发展党的武装力量。这年夏天，25岁的邓小平告别了妻子，被组织派往广西。（张纪恩 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离开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党也不会公布的，我们只晓得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后来）在报纸上看到邓小平，才晓得他到广西去了，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才晓得。

（访一对准备搬家的年轻夫妇）

记者：哇！这个房子真大！

住户：你们找谁呀？

记者：你是这儿的房主人吗？

住户：对，你们哪来的？

记者：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我们想拍这个房子。

住户：噢！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以前听老人讲，这里周恩来也待过，邓小平也待过，这个地方，中共六大的文件都是这里打印出来的。

记者：你是刚搬来吗？

住户：不，我们搬走了，这地方准备要拆迁。记者：恭贺你们乔迁之喜啊。

住户：谢谢，谢谢……

55年前，邓小平离开这里的时候，窗外是一片什么样的光景呢？

第二集

苏区风云

（字幕： 1986年1月27日桂林）

邓楠：爸，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胡子叔叔（王震）的？在中央苏区？

邓：记不得了。

王震：全苏大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

邓：噢，全苏大会，知道了。

（广西的兵能打仗）

邓楠：比四川的呢？比一下嘛！

邓：川军不能打，四川军战斗力最差。湖南兵能打。

那个时候他们（滇军）打广西，分两路，卢汉（滇军总指挥）带两个师往龙州那条路，他（滇军师长张冲）就带一个师往百色这个路，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啊。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回忆往事是兴奋的。

问：二十儿岁，那时候你？

邓：哪个？

问：胡子叔叔问你那时候二十几岁？

邓：二十儿岁？25岁。

从这个时间往前推已经五十多年了。

从我们拍片的这年往前推已经六十多年了。

中山路是南宁城里最老的马路之一。1929年修通的时候，南宁只有九万人口。

25岁的邓小平是1929年的夏天到达这里的。他要找的“广昌号汽灯店”就在这条街上。他此行的目的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做广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并发展中共在当地的政治军事力量。

（陈欣德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你看，这个就是当年广昌号汽灯店的铺面，现在是街道印刷厂的车间了。小平同志，从上海派到我们南宁来了以后，首先就来到这里。原来楼下到楼上有楼梯，可以直接上去，但是为了保护楼上同志的安全，他们楼下的同志当时要上去呢，就从后门，进出从后门走。现在我带你们到后面去看看，你看当年房子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路也比较小，比较阴暗，你们小心一点。一个门套着一个门。

（幻灯放映）

这个人叫俞作柏，是桂系军阀中的实力派。1929年春天因为他在蒋桂战争中倒向蒋介石，致使李宗仁、白崇禧败北。应该说，是蒋介石利用了桂系内部的矛盾，拉拢了俞作柏。

请注意这个人，他叫李明瑞，是桂系中一员骁勇善战的名将，北伐战争中，贺胜桥一战使他名扬整个北伐战场。虽然他和俞作柏是表亲关系，但他的革命倾向更为明显。

蒋桂战争结束以后，俞作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当上了广西省绥靖司令。他们俩虽然执掌了广西军政大权，但根基比较薄弱，又深知蒋介石不可靠，于是他们听取了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的建议，主动要求中共方面派干部支援。

实际上，俞作豫就是共产党员。

（陈欣德）

这是广昌号的后门。

在这里，邓小平先同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并把广昌号汽灯店作为他的秘密工作站。

（黄爱琴 房主）

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听老人们说，邓小平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房子可能有些什么秘密，要我们注意一下。有一天我弟弟就跑到这上面的房梁上去玩，发现这房梁上有很多洞洞，我们想可能是文物了，就把房梁锯下来，通知上面来取走，当时他们（博物馆）还给了我们 25 元钱。

（陈欣德）

都可以打开，这些洞里面是藏文件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

邓小平到广西后化名邓斌，并公开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出入俞作柏的官邸。

在他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邓斌又以培训初级军官，加强广西军事力量的名义，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成立广西教导总队，派进了一百多名共产党的干部学员。驻守在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也被共产党掌握，共产党员张云逸当上了第四大队大队长，共产党员俞作豫当上了第五大队大队长。

广西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国民党军阀的密切注意，失去广西地盘的李宗仁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党之西南根据地”。

但是，为他始料不及的事情还在后头。10月中旬，邓斌等人在南宁策动了兵变。

由南宁往西，沿邕江上溯 30 公里，到了杨美镇这个地方，一条邕江一下子成了两条江。

左边的江通往龙州叫左江，右边的江通往百色叫右江，左右两江流经的地带就是左右江地区。

“南宁兵变”后，邓斌、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把部队拉到了百色和龙州。

（韦宝昌 右江革命纪念馆馆长）

1929年10月份，邓小平、张云逸带领军队到百色的时候，指挥部设在这个地方。粤东会馆是广东商人搞商业活动聚会的地方。邓小平他们来百色的同时，派了龚饮冰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了他们准备在广西左、右江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计划。龚饮冰回来以后，带回的指示呢，两条，一条是颁布中央给红七军的番号，一条是龚饮冰回到广西后，在10天之内举行起义。

（黄丽娟 解说员）

这个就是当时红七军司令部参谋处的会议室，当时很多重要的决策会议就在这里举行，前面那个房子是邓小平和张云逸军长的住处。

（韦宝昌）

当时，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央要求在10天之内举行起义，比较仓促。他认为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所以百色起义按照他这个指示，百色起义很成功。它不像别的起义先发动武装斗争，打仗，他是先做好这个工作以后，再举行起义。这个起义是开大会、庆祝会，不是那一天打仗，它和别的起义有不同就在这个地方。

（字幕：清风楼红七军败治部旧址，它曾经是百色城里最高的建筑）

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飘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红七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斌任红七军政委。

（韦宝昌）

邓小平在这里部署百色起义的各项工作之后，按照中央的要求到龙州去，组织部署龙州起义，组建红八军。

在去龙州的路上，邓斌遇到了从龙州赶来的李明瑞。李明瑞率领兵变部队在龙州筹集兵饷，稍事休整后，又产生了反攻南宁的念头，并把部队拉了出来。他与邓斌虽然早就相互闻名，但这次路遇却是他们的头一次见面。

（邓小平）

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我是从百色到龙州，他们驻龙州，八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打红旗啊，那个时候见面。邓斌把李明瑞带回了粤东会馆，并争取他在龙州发动起义，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

（何自坚 91岁原红八军一纵队司令）

左江能不能成立红八军，不得到李明瑞同意呢，是个大疑问。邓小平同志才是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对李明瑞这么高地位的，年龄又比他大那么多，这个工作我们想得到，不容易做的。可是他一个青年，能够把李明瑞说服，走共产主义道路。

在这里，他们商定了龙州起义的行动步骤。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一段生死之情。

（邓小平）

李明瑞很不错，参加了革命非常刻苦。我和他从广西到江西，他没有骑过一次牲口，就是走路。我也陪着他一块儿走，我们两个走前面，带个先遣连。

（字幕：红八军军部旧址，这儿原来曾是一座钱庄）

1929年底，中央电令邓斌回上海汇报工作。他在龙州布置完工作后绕道越南、香港返回上海。红八军在他离开后不久宣告成立。龙州起义爆发了。

中共中央认为，左右江起义“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邓小平向中央建议，吸收李明瑞加入共产党。但是，由于受“左”倾路线影响，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却认为，对李明瑞绝不能存“丝毫的幻想”。邓小平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发动下层群众，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开展工作的上层线索。不久，中央决定由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斌任总政委。

在上海，与妻子的重聚是幸福的。

邓小平就要做父亲了。他抽空去陪伴住在医院里的妻子。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盼望到的那一天是不幸的。

妻子张锡瑗因难产而去世，生下一个女孩儿寄放在别人家里，没过多久也夭折了。

军情如火，他甚至不能亲手掩埋自己的亲人，又匆忙赶回了广西。

（李应芬 74岁李明瑞女儿）

他1930年1月底就回到龙州，接着他就宣布中央已经批准同意李明瑞参加共产党了。

邓小平后来在一份材料中曾回忆：红八军成立的时候，约两千多不到三千人，其时，我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当我回到龙州时，敌情开始比较紧急了。我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商量，由于当时左江群众基础很薄弱，八军也比较孤单，人数也不多，乃决定靠向右江红七军。

（何自坚）

他大概在3月初，我在雷平，他就从龙州到雷平来，指挥我们去打靖西。他同我去打靖西，同我在一个战壕。打到第四天了，因为向都那边党组织有人来接他，他又急于回右江去，传达中央的命令。然而打了第四天靖西还没有攻下，他就要回右江了。我就派一连人护送他，一直很顺利地到右江，同韦拔群同志会合。

（黄美伦 95岁原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韦拔群的弟媳）

六十几年了，1930年3月24日，邓小平和一个同志来。邓小平拿着棍，戴个帽。我问他：你哪里的人？他讲：我从百色来。邓小平讲的，拔群同志在这里吗？我又不敢说，后来我问他，你姓什么？我姓邓。邓什么？邓小平。他没讲他叫邓斌。后来带他去见韦拔群，他就同韦拔群讲。韦拔群问，你是

哪个啊？讲：我是邓斌。他同韦拔群讲他叫邓斌，同我讲就讲他叫邓小平。

邓斌到东兰的时候，红八军在龙州作战失败。而红七军主力此时也离开了右江，百色已经被敌人占领，只有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留守在东兰。

邓斌决定住下来，一面设法同七军取得联系，一面和韦拔群一道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还搞起了“共耕社”，重新分配土地。

（黄美伦）

在东里（村）开群众大会啊。邓小平讲，同志们，今天开这个会是光荣的，为什么说是光荣呢，“共耕社”从来没有过，今天有了“共耕社”，“共耕社”是基础，它后面是苏维埃。

（字幕：东兰武篆魁星楼）

记者： 1930年红军在这里搞起来是不是红火得很？

（陈国团 85岁原红七军战士）

那时候啊， 1930年，那是轰轰烈烈的。邓小平由上海回来以后呢，把右江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他的指示是这样，凡是参加韦拔群（队伍）三年以上的，思想进步、无产阶级成分的，贫下中农成分的都要吸收入党。

在邓小平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浩大声势。右江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13个县，100万人口，成为全国瞩目的红色根据地之但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带着立三中央的指示来到了红七军。

（陈国团）

邓岗来的时候，要调红七军北上，那时候中央要夺取大城市，要红七军打到柳州、桂林去，打到广东北江去。邓岗是这样嘛。所以呢，总政委邓政委没有办法，要走了，他北上以后我们同他离开了，没有了，不见了，一次都没见过他了。

1930年11月5日，红七军在这里举行了组建以来的第一次阅兵典礼。由于抵制立三路线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左”倾错误，站在阅兵台上的邓小平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指挥权。由于中断了同中央的交通联络，人们并不知道，一个多月前在上海举行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1月9日，红七军主力告别了右江根据地，去打柳州、桂林。绝大多数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只有七千多人的队伍要夺取大城市，将会遭遇到多么大的挫折和损失。

（黄荣 84岁原红七军战士）

四把（镇）战斗就看见小平了。敌人四面八方地冲过来，包围我们了。小平同志说，你们要有秩序地向后面走，后面由我和李明瑞把他顶住，你们后方部队先慢慢地有秩序地走，不要乱。

（莫文骅 86岁原装甲兵政委、红七军战士）

还没有打柳州，我们就打了长安，打长安就打了四五天吧，没有打下来。长安你打不下，再打柳州就困难了，柳州不能打，你打桂林就更困难。

（黄荣）

以后又打武冈，就打不下去，部队伤亡很大。小平说：撤，不能打，打不得了。就撤了，撤了以后就这个样子，不撤啊，恐怕就剩不下多少人啦。就撤下来。

（莫文骅）

原来我们出发是7500人，我们7500人出发，两个师7500人。后来打、打、打……缩编了，把师取消了，改成两个团。

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七军走一路打一路，仗越打越不顺。坚持立三路线的邓冈等人相继离开了队伍。经过7000里的迂回转战，剩下的两千多官兵总算在第二年的7月到达了中央苏区江西兴国。

四十多年后，人们在红七军出发的地方，发现了许多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

传说，邓小平、李明瑞就是在这里与韦拔群分别的。

红七军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

主力东进后，在右江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因为叛徒的出卖而牺牲，时年38岁。

带领部队辗转到达中央苏区的李明瑞被执行王明路线的人诬陷为“改组派”首领，惨遭杀害，时年35岁。

在这一时期牺牲的红军仅东兰一个县就有一千八百多人。

（李应芬）

“九·一八”（事变）后，天天我就留心我父亲的消息，《申报》经常登。后来看到有个小报登，登一篇长文章，写我父亲的，说，李明瑞亦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看了我就想哭了。当时我妈妈因为不见我父亲，整天哭得眼睛都肿了，我没办法告诉我妈妈，我就埋在心里头，真想我父亲。几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我父亲确实是死了，还是没有死。一直到解放后才知道。1986年以后呢，我晓得了，邓小平对李明瑞这么好，这么关心李明瑞，还要关心他的家属。

邓小平与江西这块土地，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缘分。他一生经历过三次政治磨难，第一次就发生在江西会昌。

（字幕：江西赣南）

（江西省档案馆）

记者：人们都知道邓小平一生有三起三落，是吧？

工作人员：啊，是的。

记者：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第一次起落的情况。

工作人员：也是在我们江西，是中央苏区的时候，1933年吧。我们这里保存了一些档案。

记者：我们能看什么档案？

工作人员：你看一下这本《斗争》，这是当年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的合订本，上面什么材料都有。

红七军脱离险情后，邓小平在江西的崇义告别了部队回到上海，写下了这份“七军工作报告”。但是，由于他与王明“左”倾领导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中央根本没有听取他的这个报告。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到苏区工作的请求。

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影响到了中央苏区。邓小平在瑞金当了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又被调到了会昌。这期间，他曾在一次大会上远远地看到过李明瑞，但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永别。

（黎新泉原江西省赣州地区公安局干部）

那天下午我们陪同小平参观会昌的老县城，走到一个小街里头，事实上就是当年他办过公的地方。一进这个院子，小平一抬头看到一棵树：哎呀，这棵树还在，大了很多。当年我就经常在这个树下看看书，看看报纸。

（凌步机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60年前，他在这里当县委书记，这个地方就是会昌县委的办公旧址。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和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提出，会昌是一个大县，而武装力量却过于薄弱，应该设立一个军事部。经罗屏汉介绍，决定调红十一军一个叫钟亚庆的副团长出任军事部长。

（钟亚庆 94岁原会昌县苏维埃军事部长）

第一次调我到那里去呢，调我到会昌，我就在江城区那儿，他（邓小平）就在会昌那儿摇电话了，调我。我说我不来，我没文化，我不肯坐办公，我背枪打仗更合适。他说我不要文化，我有文书，我就要你来，我说我没文化，他就（让人）反复来电话说，我就去了。

我从澄江到会昌，在杉塘区的苏维埃政府，小平同志就碰到我了，他正去罗塘区工作。他看到我背着个背包，他说：这个同志哪里来的？叫我。我说从澄江。你到哪里？我到会昌。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钟亚庆。好，好，我是邓小平。我就和他一起到了区政府。他说钟亚庆你很调皮，通知都下了，调你到会昌来，你今天才来，你今天不来呀，要打屁股哇！

那段时间里，会昌的扩红工作，赤卫队建设，政权建设都搞得有声有色。1932年7月，为加强边区工作，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把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连成一体，在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当上了中心县委书记。

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当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片面地

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了正规红军，并调走了守卫在筠门岭一带的红军独立三师。这样，造成了苏区南部的防御空虚，致使寻乌县城在广东军阀的大规模进攻中失守。

（凌步机）

本来这个事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苏区失守在当时来讲，丢来丢去，来来去去这是正常的，边境一般来讲都是不稳定的。但是“左”倾领导。导者抓住这个事件不放，开始了江西反“罗明路线”斗争，把它看成是会寻安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退却逃跑。

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寻乌事件”只是一个开头，它实际上是王明“左”倾领导向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党内同志实行宗派主义打击的一个部署。在中央苏区，站在同“左”倾路线斗争前列的除了邓小平，还有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1933年3月，在会、寻、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邓小平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还被撤去了职务。

这篇文章中说：在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三个月来正确的、具体的、清楚的揭发了邓、毛、谢、古的错误，并一致给了他们以严重的打击。

这就是著名的“邓、毛、谢、古”事件。“左”倾领导对他们作出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跌落。

（危秀英 84岁原中央苏区干部）

我不知道邓小平在劳动，我戴个草帽，背一个包。他就用手点，点我。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什么人在点。我以为在点我后面那些人。结果走到前头听到：秀英，秀英！我一看，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你快到省委，你给蔡大姐（蔡畅）说，说我肚子好饿，我在劳动，你不知道我的事。他说我到农村，下农村劳动嘛，劳动了几个月我不知道省委的情况。他说，你跟蔡大姐说，我肚子好饿，送点饭给我吃。哎呀，好可怜的呀，真是。

（刘英 90岁原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

但是，他那个时候受的这个打击，他从来不透露，他好像没有这回事。所以人家更同情他嘛，但是他从来不讲。

30年代发生的这个事件，毛泽东记得很清楚。

（车上对话）

记者：老凌，你还记得吧，林彪事件以后，小平同志当时在江西下放劳动。1972年，他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毛泽东在8月14号那天作了批示，好像他说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我记得好像是原话。

凌步机：是的，是的。

邓小平 1972 年冬天的赣南之行，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之后。

（黎新泉）

1972 年 12 月 8 号的上午，我们陪着小平同志和他夫人一起到了（会昌的）文武坝。在看了这个（毛泽东）旧居的门口，小平同志似乎心情比较沉重，讲了一句，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我们随行人员中没有哪个吭声，不好吭声，比较敏感。

1934 年，被王明中央撤消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在会昌城外的文武坝写下了他的《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33 年的夏天，由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贺昌的热心帮助，邓小平被调到了红军总政治部。

这个 10 年前巴黎《赤光》杂志的“油印博士”，在这里重操旧业，于上了《红星报》的主编。

（刘英）

贺昌非常喜欢小平同志，他说他是个人才、笔杆子，很能写东西，对什么工作他都有兴趣，分给什么工作都可以做，他做工作是很卖力的。

“《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红军里一切工作和生活的长处、坏处都可以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

“它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字幕：白屋子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刘英）

贺昌同志跟我讲了以后，我对他的印象加深了，所以我跟他接触就多了。他这个人呢非常活跃。很多人都同情他，实际上他处的环境还是挺好的。

（刘礼青原瑞金纪念馆馆长）

小平同志来到这里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原来塌掉了，我们也找不出，不晓得哪一间是《红星报》的编辑部。小平同志一来这里看呢，看到这个屋基，他很肯定他说，我就在第二间。他一到这个地方，他就兴奋起来了。

（刘英）

村子就只有那么大概嘛，所以我们很近呐，过一个田埂就到他那儿去，他就来啦。聊天就是娱乐，会合在一起就是精神会餐，就是娱乐。我觉得他这个人满不在乎，他从来不给我漏过。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嘛，他觉得毛主席是对的嘛，一直坚持嘛，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嘛。

1933 年和 1934 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是祸不单行的年月。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南方根据地，开始了战略转移。

邓小平和他的《红星报》被编在“红章”纵队里。

（字幕：于都河）

渡过于都河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对邓小平来讲，这已是第二次长征了。四年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整整走了 7000 里。

（刘英）

长征的时候很苦，没有东西吃，大家就精神会餐，谈吃的吧，什么地方的东西好吃。他就说他四川菜最好吃，我们就说，我们湖南菜也很好啊。所以非常乐观。我们喜欢听他吹，我们叫他吹牛皮，牛皮公司，老想要他吹，大家笑一笑要高兴一点。

1935 年 1 月，邓小平随“红章”纵队到达遵义。

在这之前，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已经对“左”倾错误领导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邓小平再一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

（字幕：贵州遵义）

（田兴泳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

小平同志对遵义、对遵义会议很有感情。第二次（19）65 年这次来呢，就是我接待的这一次，他一踏进这个地方很兴奋的，一直走到会议室。小平同志就跟身边的同志讲，他说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小平同志因为遵义会议前受排挤，那么遵义会议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个转折，对小平同志来说也是小平同志一个转折。据他回忆是毛主席提议他当中央秘书长的。

许多年之后，女儿毛毛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

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

第三集

戎马生涯

邓小平曾几次对外国客人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二野战史编写组成员。

（邓小平）

二野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在战争时期，二野从头到尾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局面，二野都处在这个局面的前面。

这些曾跟随邓小平南征北战的老将军，至今还亲切地称他为“邓政委”。这个称呼，从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开始了。

（资料片解说）

中华民族争取生死存亡的奋斗连同7月7日这一天开始了。同胞们，我们的敌人是这样的凶狠强暴，我们除了牺牲到底，是无法求得生存的，他们要使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都变成他们的牛马，我们全中国的民众要把这群野兽一样的日本人赶出国境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宣布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三个师。

3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邓小平在抗战期间的唯一一个电影资料镜头。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区的辽县，也就是今天的左权县，有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名叫西河头的小村庄。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二九师的师部就驻扎在这里。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改任一二九师的政委来到这里。从这时起，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记者：老人家，来打扰您了，我们来跟您了解一下，当年一二九师师部在这儿吧？

老头：整个师部都在这个院，这问就是师部的办公室，那间就是刘伯承住的屋，邓小平就住这个屋。

师长刘伯承生于1892年，比邓小平大12岁。他们两个都属龙，又都是四川人。在太行山区的抗日烽火中，开始了他们长达13年之久的合作。由此传出了“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半个多世纪后，我们采访了原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

（宋任穷原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

他们两个人前后共事 13 年，小平同志同伯承同志是互相尊重的，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两个人的工作配合得很好。

太行山纵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后，在这里创立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2 月，日军三万多人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蒋介石下令反攻太原，八路军的任务是切断敌后方交通，配合友军行动。一二九师打响了长生口战斗。这是新政委邓小平参与指挥的第一仗，首战告捷。

（杨国字原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

以后打响堂铺、神头村、关家地这一系列的战斗，他（邓小平）没有一次不在场，每次都在场，这样就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另眼看待，他又是四川人，大家对他特别亲热，你别看他严肃起来不说话，可一说话，就像打出一颗子弹，那你就非执行不可，虽然话不多讲，也不讲空话，讲一句，算一句，讲了就要办到，办不到的话他不会讲。

一二九师在晋东南连续组织的一系列战斗，使日军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一年的 4 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倾其全力向晋东南地区实行“九路围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行了 26 天的反围攻作战，消灭日军四千多人，收复县城 19 座，最后将日军全部赶出了晋东南，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随后，刘邓又率部实施第二次战略展开，挥戈东下冀南、冀鲁豫平原，开辟了敌后平原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今天的太行山人很少知道，抗战期间盟军在延安与太行山之间开辟了一条空中通道，运送了许多国际友人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来到这里。1938 年，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埃文斯·卡尔逊来到了太行山根据地。

（欧阳山尊原抗战文艺工作团英文翻译）

我们是从延安出发，经过晋西北、晋察冀到冀中，然后冀中吕正操同志派人把我们护送到南宫。不久，邓小平到了南宫。他们谈了好几次，特别是谈到一个问题，是个国际问题，就是美国对中国人民同情这个问题，卡尔逊提到美国人民是倾向于八路军的，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关于美国把废钢铁卖给日本。因为日本自己原料很缺，而炼钢需要废钢铁，要废钢铁才能炼出钢来。日本没有，是美国供给它。我记得当时说是美国把一半的废钢铁卖给日本，另外一半卖给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又转口卖给日本，当时这样说的。这个事情使卡尔逊很震惊，他不相信，他说：“不呵，美国人民是同情你们中国的，你这个消息确实吗？”小平同志说是确实的，而且指明这是你们美国一个新闻社报道的。

卡尔逊回到美国后不久，还真的去查了资料，证实了邓小平说的话。不久，他辞职退役，认真研究起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战略思想，撰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用不少笔墨写到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头脑像“芥菜一样辛辣”。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被外国出版物介绍到西方。

抗战时期的延安，吸引了大批热血青年，他们冲破层层封锁来到这里追

求革命真理。

（资料片解说）

我们整个民族，结成了一支燃烧的队伍，光明的队伍。美丽的火把，耀眼的火把，热情的火把，金色的火把，赤烈的火把，让我们跟着队伍去吧，跟着队伍到那边去，到那火把出来的地方去，到那喷出火光的地方去！

在这滚滚的洪流中，有一个女青年，她的名字叫浦琼英。1937年11月，浦琼英步行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她同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一起，很快地习惯了延安那种艰苦却充满生机的战斗生活。她的名字也从浦琼英改为了卓琳。

1939年8月，卓琳认识了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邓小平。

（刘英张闻天夫人）

那也很有意思的，多少年没有见到小平同志，1939年他才从前方来的。来的时候原来是准备开“七大”的，后来“七大”没有开，因为学习文件，推延了。前方需要，所以他不能等待。但是他没有一个爱人，大家就关心他，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个爱人。那时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所以他要找个爱人，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公已经毕业了，就介绍给他。那时他要回前方去，只有赶快结婚了，结了婚才好带走。所以这个时候，中央就给他组织了一个结婚仪式。这个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毛主席那个窑洞外面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在那个地方很热闹，小平同志和卓琳，还有孔原和许明，两对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到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主席夫妇也到了，我同张闻天也到了，富春同志、蔡大姐也到了，还有王首道秘书长也到了。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是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许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时不喝酒的，他怎么能够不醉呀？那么多酒，一杯杯的，他还很豪饮，来者不拒。大家给他敬呀，他喝那么多酒，怎么不醉呀？闻天就讲，他说有假，我说什么有假？他说是白开水。

这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婚后不久，他们就一起回到了太行山。

1940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本侵略军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在很短时间内，摧毁了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的张香山，看到了这样一幕：

（张香山原一二九师政治部科长）

有一天，参谋打电话叫我到他那个地方去。一进去，看到他们两位，邓小平同志拿着洋蜡，他们在看贴在窑洞墙上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找地名。小平同志拿着洋蜡，因为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的，不大方便看东西，所以有些地名要找到，小平就拿着洋蜡。刘师长顺着洋蜡的光看地图，一个说这是

什么地方，然后两个人就商量，怎么样跳出包围圈，非常亲密的，真正亲密的战友。

1940年的年底，一二九师的师部搬到了河北涉县的赤岸村。此后的五年时间里，这里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邓小平和刘伯承就住在这座小院里。

这时的邓小平除了抓军队建设外，还十分注重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他先后撰写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太行山区的经济建设》、《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报告》等文章。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报告中，邓小平较早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高度赞扬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些文章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由于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严密封锁，使得抗日军民处境非常困难。面对根据地的困难局面，邓小平在赤岸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号召根据地军民以武装斗争为核心，正视困难，克服右倾情绪，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反击日军的“扫荡”和“蚕食”。

在刘邓首长的带领下，太行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拿枪抗击日军，一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从1940年到1943年的四年间，太行山根据地没有向党中央要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不但改变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困难局面，还在物质上支持了其他根据地，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彰。

1943年1月，邓小平在温村主持召开了中共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就五年来的对敌斗争情况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作了报告。这年10月，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邓小平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刘伯承等一批高级将领在党中央安排下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太行山上，留下了39岁的邓小平独立主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田西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学会理事）

太行这段可以说是小平的思想逐步地走向成熟的主要阶段。也就是说，作为小平，在他的政治、军事、政权、经济、群众这么诸多工作中，太行他都是比较全面的。作为党，他是第一把手；作为军，他是和刘师长一起领导一二九师。刘师长和彭总走后，他是八路军总部第一领导，在前方的第一领导；作为政，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整个政权这一套也是他在这儿独立领导。所以说，在小平一生中太行这一段是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走向成熟的最重要的时期。到1943年、1944年，太行山是个大丰收年，1945年物质相当丰富，社会相当安定。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太行山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会议选他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随后，毛泽东给邓小平专门发来一封电报，表示祝贺，并要他赶赴延安

参加七届一中全会。

日本投降了。八年的抗战结束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成为拥有 2400 万人口，30 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太行山养育了这支部队，刘伯承、邓小平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这块土地上战斗和生活的岁月。

人民欢庆胜利。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

1945 年 10 月，刘邓指挥部队胜利地进行上党、平汉战役。以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解放区的主力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从这时起，人们称这支部队为“刘邓大军”。

全面内战爆发后，刘邓大军在陇海路南北先后九次与国民党军较量，九战九捷，打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

全国自卫战争打了八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一百多万人。蒋介石改变战略，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

毛泽东决心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立刻转入战略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他选择了刘邓大军。

（杜义德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

这儿是陕北，这儿是山东，刘邓大军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就在这个地方，正好是中间。邓政委说，我们就好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山东，一头挑着陕北。不管这个担子有多重。我们只有打过黄河去，才能把山东和陕北的敌人拖出来。

1947 年 6 月 30 日深夜，刘邓大军 12 万人马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即在鲁西南大地激战 28 天，一下子歼敌王牌部队整编六十六师。

毛泽东看出，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东临南京、西逼武汉的大别山地区，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毛泽东要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字幕：刘邓大军跨过陇海路）

（陈锡联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原来我们过陇海路后，准备休息一个礼拜。休息一个礼拜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恢复体力，捉到那么多俘虏、装备，整理了以后再走，走还是要走的。另外一个看情况，有机会的话依托根据地再打一仗。毛主席以个人的名义向邓发出一个秘密电报，说陕北的情况非常紧张，意思是希望我们进大别山，在中途再不能犹豫了，要赶紧走。

这是一着险棋。

邓小平后来回忆：我们看完后立即烧掉电报。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啊，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大别山。实际上不到 10

天，我们就开始出发了。这一走就是 1000 里。

刘邓大军 12 万人马，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有追兵，前有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的阻隔。要完成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按时到达大别山，困难重重。邓小平说：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杨国宇）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到大别山。过黄泛区是很难的，陈锡联的大炮陷在里面没法走，邓小平下决心大得很。有些人哭的哭，叫的叫，走不动，前面又是飞机，后面又是敌人追击。他狠心一下，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打到大别山去。大炮炸掉，不惜一切地炸掉，汽车甩掉，人陷在里面，邓小平、刘伯承拄着棍子，跋上跋下，黄泛区过了，又过沙河。

到了汝河，前面敌人的火力阻击很猛，后面追兵只有 30 里。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邓小平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

8 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在北岸。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持竹竿，亲自探测水深。

刘邓大军冒险淌过淮河，刚刚走出五里多地，追兵就赶到淮河北岸。不料河水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得望河兴叹了。

（字幕：刘邓大军淌过淮河）

（廖中楷，息县水文站站长）

1947 年，据我们水文历史资料推算，8 月份有一次洪峰水位，当时的水位下去了以后，上游降雨大概有 150 毫米左右，中游水位变化大概 4.7 米，流域洪峰空过时间大概 20 个小时。

记者：那么根据您的介绍，当时的刘邓大军淌过淮河就是在两个洪峰之间，抓住了那个空隙，是吧？

廖中楷：对！

（郭汝瑰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起义将领）

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进军大别山呀，那是纵井救人，跳到枯井里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那刘邓是最危险的了。进去，他本身是个危险的事情，他敢于，他一进军大别山，就把整个状况都变了。（国民党）所有人马，大别山分一部分，徐州分一部分，华北又分一部分，济南又分一部分，国民党的部队都分散了。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调集 33 个旅进行全面“围剿”。大别山的形势骤然紧张。

在大别山里，刘邓大军度过了抗战胜利后最艰苦的一段岁月。

冬天来了。刘邓大军在风雪荒野的大别山，没有后方，缺衣少粮。他们

既要同“围剿”的敌人作战，又要自己设法解决给养。邓小平号召部队勇挑重担、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一切为了在这里站住脚。

为了调动和分散敌人，刘伯承率一部分部队跳出包围圈，在淮北指挥全局。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率另一部分部队坚持在大别山内。

在最困难的时候，粟裕曾提出率几个纵队前来增援。邓小平说，我们在大别山就是为了吸引敌人于我周围，减轻兄弟部队的压力，他致电中央：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对全局极有利。

很多年后，当有人问起这段经历时，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二野挑的是重担，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完成了任务，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它带动了全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的转变。

1948年春，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一起，逐鹿中原，驰骋于江河淮汉之间，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中原防御体系，创建了拥有几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

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1948年秋，被中外史学界称之为“中国世纪大决战”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拉开了战幕。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决战阶段。

随着中原和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郑州，蒋介石收缩在徐州地区的南线主力，已处在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夹击之中。

1948年11月，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开始了。

国民党军投入兵力80万人。

人民解放军兵力60万人。

（陈忠新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馆长）

这是坐落在江苏省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是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国共两党都非常关注。蒋介石强调说，徐淮会战实为我国家存亡之最大关键。毛泽东主席也明确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

为了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五人总前委，成员有：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统一指挥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

毛泽东主席说，两支野战军加在一起，不是增加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

几倍的力量。

（字幕：淮海战场旧址）

淮海战役波澜壮阔。规模空前。双方共投入兵力一百四十多万人，仅我方支前的民工就动员了五百多万。总前委成立，使淮海前线有了统筹一切的总指挥部，这对于正确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组织战区党政军民对敌斗争，动员后方人力物力支前，起了重大的作用。

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华东野战军于碾庄全歼黄伯韬兵团。

第二阶段怎么打？

（张震中央军委副主席）

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一看到这个情况，只有把黄维兵团歼灭，因为黄维兵团也已经走得精疲力竭了。同时他也离蚌埠比较近，那面南京的部队逼近。把南京和徐州拉开，所以决定先打黄维兵团，以后再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消灭杜幸明兵团。

记者：当时黄维兵团力量是不是很强，是比较难啃的骨头？

张震：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所以中原野战军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朱敦法原国防大学校长）

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情况怎样呢？1947年渡过黄河歼灭国民党军九个半旅以后，接着又千里跃进，挺进大别山。千里跃进挺进大别山，这是在解放战争史上相当有意义的一笔，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原野战军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当时的非战斗减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消灭黄维兵团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当时小平同志告诉中野的部队，只要能歼灭黄维兵团，哪怕是中野付出再大的损失，甚至说道，即使打光，能争取全国的胜利，也是非常值得的。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刘陈邓先打黄维的决策，并指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四十多年后，我军电影工作者将这段历史真实地搬上了银幕。

（故事片《大决战》片断）

11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主力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

（小李家村）

小李家村，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在淮海决战最紧张的时候，总前委的三个常委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就是在这里指挥整个战役的。他们亲密合作，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策，及时作出正确的部署，每项作战计划决定后，邓小平又承担大量的组织实施和前敌指挥工作。

从这张当时的照片看，一向军容整齐的邓小平，忙得连胡子也没有来得及刮。

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歼，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1949年1月10日，杜幸明集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结束。

淮海战役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是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斯大林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在他的笔记本中写道：奇迹！真是奇迹！

（张震中央军委副主席）

淮海战役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说：“淮海战役，好像是一锅生米饭，还没有煮熟，就在小平同志统率指挥下一口一口地吃掉了”。

淮海战役的胜利，对全国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线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直指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西柏坡）

1949年3月，邓小平来到这里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邓小平第一个在会上作了发言。会后，毛泽东在召集邓小平、陈毅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时对邓小平说，就交给你指挥了。

（字幕：安徽肥东县瑶岗村）

总前委曾经居住在这个小院里。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张震中央军委副主席原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号，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要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所以他自己写这个作战纲要。

（孙新渡江战役纪念馆负责人）

4月1号，以华东台这个名义向中央报告了这个纲要。中央同意这个纲要。以后这段时间，总前委在这个地方主要负责渡江战役前的敌情侦察、人事组织安排、支前工作、部队的训练以及渡江战役的实施。

记者：您给我介绍一下渡江战役最先突破口是哪个地方？

孙新：突破口在繁昌的两侧。

1949年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一千多华里的战线上横渡长江，一举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

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南京回到了人民的手中。1949年4月27日深夜，邓小平与陈毅渡过长江，步入蒋介石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

这天晚上，他们住在了这里。

第四集

十七年间

（字幕：1949年6月摄于上海）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新中国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家搬到了上海，两家人合住在一栋小楼里。

从1931年夏天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这时已经整整18年了。18年的经历太多了。

半生戎马，他很少与家人团聚。

安顿下来，他和卓琳一同去祭扫张锡绶。

在江湾公墓，夫妻俩找到了张锡绶的墓地，并把她的遗骨重新装好，搬回家中，放在楼下。

（字幕：张锡瑗）

但是，仗并没有打完。

蒋介石不甘失败，决心与人民解放军作最后的顽抗。他亲临重庆，精心部署了西南防御战略，妄图以此作为反攻的基地。解放大西南，也就成了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役。

要打大西南，核心是拿下四川。

1949年10月20日，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运动。次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由北京赶赴郑州，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制定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计划。

刘邓先是做出大军要从郑州向西动作的假象，然后突然从东西横跨500公里的地域发起多路出击，直取湘、黔、滇，造成对四川的夹击之势，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部署。

11月23日，邓小平在湖南常德受命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就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11月30日，陈锡联兵团解放重庆。

12月27日，二野与一野协同作战，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形成袋状包围，一举全歼胡宗南守敌十万多人。仅仅两个月，西南战役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29年前，16岁的少年邓希贤，从重庆走出四川，去寻找自己人生的道路。今天，他和他的战友带着解放大西南的千军万马回来了。

这时，他已经是45岁的中年人了。

（胡康民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重庆市委这个机关大院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陈列馆。右边是重庆谈判的地方，前边这栋房子是西南局1950年盖的办公大楼。在解放前这些地方都是一个一个小院，这栋房子是1949年国民党最后跑到重庆来的时候，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就住在这里。很多的历史建筑现在都

还存在。过去蒋介石住在这里，这就是蒋介石、宋美龄的公馆。解放以后，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就住在这栋房子里。毛泽东 1945 年曾经到这里来跟蒋介石谈判。这是有名的历史镜头了，就是在这个门口照的。

过去，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从这里出出进进。如今，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是毛泽东的几员爱将。

（字幕：贺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

（字幕：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字幕：邓小平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邓小平常用这三个数字来概括西南局当时的工作任务。九十万，就是要把九十万原国民党军队改造过来；六千万，是要把西南的六千多万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六十万，是要把我军在西南的六十万部队迅速转变为工作队。

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雄心勃勃，一心一意要建设好大西南。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人更知道四川人的苦衷。

（资料片解说）

西南刚刚解放，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南局召开了西南局委员会会议，首先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心西南人民渴望了 47 年的成渝铁路。各个委员作了反复的研究后，定出了修建铁路的周密计划，提请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几个月前，邓小平在上海结识了陈毅的堂兄——兵工专家陈修和。

（陈修和陈毅的堂兄）

上海解放以后，邓小平就在上海。邓小平知道我去了以后，就在陈毅那里我和邓小平见面。见面后我们还一块吃饭。大家都是留法同学，又是老乡。陈毅跟邓小平他们是共产党老战友，大家是老朋友、老同学，所以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讲。邓小平当时就说他现在要解放西南，他要到西南去可以修成渝铁路，那么就希望我跟他一块去。四川辛亥革命就是为了成渝铁路。清朝要把铁路卖给外国人，四川人不干，大家起来（组织）保路同志会来反对清朝，四川人都懂得，很不容易的。蒋介石那个时候他们自己不修，给法国人修，这个事情法国人没成功。所以蜀道难。

几十年了，四川人民流血流汗，出力出钱所铸成的只不过是这么一座血泪深仇的纪念碑。

（陈修和）

那个时候，朱德总司令推荐我当全国政协第一届特邀代表，所以我是全国政协第一届特邀代表。那我说我不能跟你去，我要回北京来开会，那么他

说你给我介绍一些人，我就介绍了 70 个人，都是科技人员，都是科局长，国民党时当过厂长的，当过市长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留学生。跟他一块儿，都到重庆来预备修铁路。他（给我的信上）就说，修和兄赐鉴：面托物色兵工技术人才的事，想蒙办妥，兹派陈志坚来沪办理此事，请赐接洽。关于安家费用等项，亦请商同处理，弟邓小平上。四川几代人盼望的成渝铁路，终于在共产党开始执政的时代修成了。

开工的那一天，连西南局的家属孩子们都来了。

（孙振华原二野老战士）

铺成渝铁路，从大渡口开始铺轨，一直铺到九龙坡。铺到九龙坡时，邓小平同志和他的老师（汪云松），都那么长的胡子了，他带着他老师到大渡口参观，坐的平板车，那时根本没有票车什么车的，只有八个平板车修这个成渝铁路。他坐的藤椅呀，我们都还看到给摆得好好的，他的警卫就站在平板车高头。火车冒的那烟子，邓小平根本也不在乎，他照样坐在那里。

去高山之国尼泊尔的时候，可以从空中俯瞰这片雪域。

邓小平虽然没有到过西藏，但是西藏的和平解放却和他的名字联在了一起。建国初期，外国的一些政治势力利用宗教和历史上遗留的民族矛盾插手西藏问题，企图使西藏与祖国分裂。

就在邓小平到达重庆的 20 天以后，出访苏联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写着四个 A 的急电。他改变了原来准备由彭德怀率部从新疆、青海进军西藏的计划。决定把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改由西南局来完成。

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急迫。

这个时候，二野的许多官兵却已经脱下了军装，转为了工作队。但是仅仅过了六天，邓小平就回电毛泽东，进军西藏的计划已经安排妥当。

（李觉原十八军第二参谋长）

小平同志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就是解放西藏的问题，主要是个政治问题，有军事问题，但是如果政治和军事来比较的话，还是政治是主要的。

（阴法唐原十八军五十二师副政委）

毛主席规定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接着呢，小平同志提出来，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而且讲到进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我们为了消除民族隔阂，争取藏族同胞，没有饭再饿着绝不能够吃老百姓的东西，在风雪天气没房子住，也绝不住喇嘛寺庙。

（李觉）

部队是很好的。（藏民）话不懂，事他可以懂，你给他把水弄到他的水缸里，他总认为是对的吧，你把地给他扫一扫，扫干净总是对的吧，就是语言不通，行动来表现。

（阴法唐）

这以后，唉呀，群众一看，这个部队太好了，原来听说江东来了解放军

很好，现在实际看到了，那个时候就说新汉人菩萨兵。

在和平进军西藏的同时，邓小平在重庆起草并向中央提交了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的十大政策。

他明确提出：“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的各种制度维持原状不予变更”，“达赖活佛的地位不予变更”。

他真诚他说：对西藏的这十条，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

但是，通往西藏的和平道路十分艰难。

1950年的冬天很快就要来了，进藏部队的粮食供应已经极度困难。西藏那边非但不接受和谈的条件，还调集了大批的藏军封锁了昌都，把进藏部队挡在了金沙江以东。

（陈明义原十八军第一参谋长）

和平解放西藏嘛，我们不打嘛。可是不让我们过江，怎么办呀？所以昌都就打了一仗，那时邓小平同志说，打呀，不让过江，干呐，所以昌都战役我们就打过江了啊。

10月19日，进藏部队被迫发起“昌都战役”，从而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第一道大门。

第二年的春天，西藏和谈全权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来到重庆，这是他头一次见到邓小平。

一个月后，他在北京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西南是少数民族成分最多、最复杂的地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费孝通原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

现在算起来已经有45年了，也就是我们刚解放后这一年，我们西南访问团一到重庆，小平同志就召见我们，同我们讲了西南的总的情况。记得小平同志强调的，首先要了解，要实事求是，不能主观主义地决定我们的政策做法，而且要重视少数民族在解放事业里边的地位，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首先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开国一年在西南》，邓小平在这篇文章中告诉人们：由于我们采取了谨慎的方针，一般说来，没有出什么较大的乱子。但是实际情况的发展，要求我们在民族杂居区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组织联合形式的政府”。

（杨代蒂原彝族土司、四川省政协副主席）79

我就当选为副县长，以后凉山军政委员会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就是副主席。土改嘛叫做民主改革，内地叫做土改。所以在民改的时候，民族政策有这么一条，说民族上层和民族领袖点头，同意改就改，不同意改就不改。所以说既解放了奴隶，又照顾了奴隶主。我刚才谈的这些，都

是当时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的时候搞的嘛。

在西南将近三年的日子，邓小平过得紧张、兴奋、痛快。

1952年7月1日，邓小平在参加了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庆祝典礼之后，带着全家离开了四川。

三年里，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化。三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相继在曾家岩出生。他的继母夏伯根也从广安老家搬来和他们住在了一起。五口之家变成了八口之家。

这次出川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戎子和 原财政部副部长）

他一到财政部就问，说是毛主席党中央对财政工作有些什么具体指示，就问我们，我们就给他讲，他听，你讲。比如说，我们讲到毛主席讲过这样的话，讲过关于编预算，收入要打足，支出要打紧，留有余地。他听见这几句话，他说好，就按这三句话编咱们1954年的预算呀，就按这个方针来办。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就受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

1953年，在他之后调到北京的原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原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结成联盟，进行分裂活动，危害党的团结。

在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自己回忆说：毛泽东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

“高饶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对团结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七届四中全会形成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顺着怀仁堂西侧的胡同往里走，路的左边有一排院落。邓小平的家就搬到这里的三号院。50年代初期，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这段时间，邓小平十分繁忙，他同时还兼任着西南局、中共中央组织部、国防委员会等许多部门的职务。1954年4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5月，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八大”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推举邓小平来担任这个职务。

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实际上外

国的总书记就是中国的秘书长。

他说不顺，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毛泽东是这样“宣传”的：
他比较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年。9月15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确定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刘少奇）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周恩来）

我们是能够动员一切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中胜利前进。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党章草案与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并没有根本原则的不同，而且应当说，草案的基本精神，正是第七次大会所规定的党的工作的各项原理的逻辑发展。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发展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断地加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在随后举行的八届一中全会上，52岁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薄一波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怎么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1956年党的八大就开始了。在那里面中心的问题讲到，今后就是那一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当然还有阶级，国内说不是没有阶级的。但是那个大规模的、疾风暴雨的那个情况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工作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

“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并富有创造性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八大”以后，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太原、兰州、西安等地视察工作，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邓小平）

我确信这一代青年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能够无愧于伟大的

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青年万岁。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历史课题。前进的道路艰难而曲折。

1957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的判断，党在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左”的偏差。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它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同时也出现了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盲目求快的“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超乎寻常地提出，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要求各行各业都支援“钢帅升帐”。

（薄一波）

这叫做六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用土办法。土办法是什么办法呢？就是咱们那个铁匠炉，你们知道过去有那个打铁的铁匠炉，这是中国几百年，快上千年的历史就是这样的。炼下来的根本不是钢，炼不下钢，叫铊铁块，根本炼不下钢。这又做了这么一件大事情，这一个造成的损失非常之大。

对于自50年代后期起一段时间党的失误，邓小平坦言他也有份。

（邓小平）

你一定要记下来我说的话，我是犯不少错误的，确有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只是可以说，犯错误也是一种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

（字幕：庐山）

其实，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毛泽东比较早地察觉了。从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开始逐步纠正。

“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初衷，确实是想以他特有的方式解决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向。彭德怀秉直上书后，毛泽东改变了会议方向，纠“左”变成了反右。

邓小平因为腿部骨折留在北京，没有参加这次庐山会议。

（宋任穷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庐山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因为骨折，腿骨折，没有上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开过以后，我们到北京医院去看他，他的脚是吊在杠子上的。他沉思了片刻以后，他对我们讲，他说彭德怀同志不论有什么错误，但是，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有很大功劳。

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很难再为彭德怀多说些什么，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61年，中央决定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甄别平反，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雷厉风

行，果敢地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要求对全国县以下干部，统统甄别，来个一风吹，都不要留尾巴。结果，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群众得到了平反。

邓小平当了10年总书记，他说：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10年。

对于邓小平的才能，毛泽东十分赞赏。

这份毛泽东为八届七中全会所写的讲话提纲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他的心意。他写道：“我为正帅，邓为副帅”。

（李越然 原中共中央代表团俄文翻译）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对赫鲁晓夫讲：我不想当主席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赫鲁晓夫说，是啊，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的这种体会就愈加深刻。作为中苏两党间谈判、论战的中方主帅之一，从50年代到60年代，邓小平曾多次率团出访苏联。仅1960年他就去了三次。

1963年，中苏两党间的关系彻底破裂。当邓小平率代表团回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机场迎接。建国后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国家领导人，这是少有的一次。

从1957年到60年代前半期，在中苏两党的激烈争论中，我扮演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1989年，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

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从60年代初，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急，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号召全党重新立足国情，调整和恢复经济，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这一年的春天，邓小平和彭真去了北京郊区的顺义和怀柔。

（彭兴远 原北京市顺义县委书记）

到现在我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话，说你们县大理石厂怎么样呀？当时我说，我对大理石厂很少接触，我说情况我说不清楚。他说那好，谈不清，你在哪方面情况了解的多呀？我说我了解比较多，我经常跑的是农村，他说，那你就谈农村情况吧？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连续三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又雪上加

霜，不少地方甚至饿死了人。在农村，人们开始自发地抵制“左”的政策，有些地方还悄悄搞起了生产自救。

（王志儒 原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党委书记）

邓小平一来的时候，就先给我们解开思想疙瘩，怕我们有顾虑。先说，一开口就先说，你吃食堂，社会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你不吃食堂也叫社会主义，你吃食堂光荣，你不吃食堂也光荣。就这么给我解释。你猜怎么着，我那思想解放没有，没有。我的思想顾虑还大着呢，因在食堂问题上我尽挨批了。后来去到张庄，那块有个河沟过不去，司机让我们俩下来了，道边上就有一块三角地，这三角地呀好家伙，我们一看那地使铁锹翻的，翻得一铁锹多深，翻得暄腾着呢。好家伙有五个大粪堆，一个粪堆里冲看有八百斤。他就问我，种十边地有没有好处？这家伙，我这个脑子里边……他去（来之前）我们准备了三天，都说什么就没准备这个，也没预备这个，所以说他（邓小平）看出来了我这个样子，他就接过来了，他说开展十边地有好处，你看看，地翻得这里这么老深，这五个大粪堆这么老大，那你说它会不打粮食？我说，那怎么会不打粮食。他说打了粮食，就是不卖国家，人吃了还省国家供应呢。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之后，邓小平对恢复农业生产提出了具体的意见。5月10日，他和彭真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他们建议：“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一便利”。

“对包产的方法是不是可以采取包产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的购四留六”。

“把生产队的分配与社员的生活分开来”。

毛泽东对他们的这封信十分重视。

几个星期后，在中共中央修定的“农业六十条”里写明：取消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

（薄一波）

第二个问题在他主持下，搞了一个工业七十条，就是工业企业的管理方法。中间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做专业化协作，二个呢，实行厂长负责制。在这个时候，也有个别人提出来反对，说你这跟毛主席历来主张支部设在连上的精神不一致，你们这是错误的。但是，小平同志根本也没有理睬这回事。说这是工厂，这和军队不完全一样，你完全叫他负责任不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呢大家反对，翻出来了工业七十条，像康生他们把这本书拿到毛主席那儿批。毛主席至死也没有批这本书。

（邱少秋画家）

·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他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呀，是嘛。

（谭昌容画家）

1980年7月4日当时他（邓小平）是一家人在这里休息，我们在这里画画，邓林也来参加跟我们一起画画。他的女儿邓林也是画画的，就跟我们同

行。这样邓林就跟我们讲，她说你们画了这么多画放在这里，是不是请我父亲，她叫老爷子，老爷子来看一看。

（邱少秋）

后来听说要来，但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也没通知具体。突然他要来了，我当时就每一个房子去串。他突然来的时候兴趣很浓，一幅一幅地看，一个画家一个画家地接见。

（问）他看到那个白猫、黑猫图了吗？

小平同志看了这幅画呢非常兴奋，他就讲，唉呀，这幅画真有意思嘛！他说给我画的真有意思嘛！实际就是重实践，只不过他这个更形象，用一句四川土话。

（路金栋 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据我个人所知，小平同志讲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当时实际上讲黄猫、黑猫，不是讲白猫、黑猫，现在文选上引的话是准确的。那么后来这个话怎么又是变成什么白猫、黑猫了，甚至有的地方讲什么花猫、黑猫了，这是从“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一种群众的批判性的语言中间引出来的。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中央主席到县委书记出席会议的代表共7118人，这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吴冷西 原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

小平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中呢，他的位置也很特殊啊，起的作用也很特殊。开始的会这个基调怎么定呢？那是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检查1958年以来中共中央所发的所有文件。后来形成一个形势报告，而且在这个报告里面，一个正视困难，一个作自我批评，一个总结经验教训，一个全力进行调整。那么这个基调，就在这个报告里面就定了。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间，他跟少奇同志合作得非常好，是他跟少奇同志一起，起草大会的主旨报告，讲的过去四年犯的错误，提出集中力量搞调整，争取两年里面恢复国民经济。

规模代表着气度，共产党以务实的精神开始了对工作的检讨。

1月30日，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七千人大会整整开了28天。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1962年的春天又勇敢地向前迈了一步。

这时候，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是全党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许多地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纷纷要求包产到户。7月7日，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他引用了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

鼠就是好猫”，形象地说明，要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党的政策。

这句话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

（胡克实 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晚上，不知道是看表演还是看赛球了，正在这当中，就来了电话找胡耀邦，接完电话以后，他就回到那个地方。回到那个地方，他（胡耀邦）跟我就说，说小平同志来电话了，说他昨天讲的有两句话不要传达。就说主席在北戴河召集他们几个人谈了谈，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主席就讲，现在，有一股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风。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农业生产上出现的“单干”风，并重提阶级斗争。

尽管在这之前，邓小平曾交待过他的话不要再传达了，但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体现他实事求是是一贯思想的名言，还是广为流传起来了。

就在他最忙碌的 10 年当中，孩子们渐渐长大了。

第五集

千年危艰

（字幕：中南海含秀轩）

中南海里有一所叫含秀轩的住宅，是邓小平的旧居。五六十年代，他在这里日理万机，为党和国家操劳了十多年。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忽然有一天，这里竟变成了党中央总书记被监管的地方，而且，这一“管”就是三年。

邓小平传奇般的政治经历，一直为国内外关注。1984年，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特意问他：您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感慨他说：“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缺乏思想准备。

1966年三四月间，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赴西北各地视察工作。一路上，他谈笑风生，主要的话题是要人们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4月8日，当他接到康生的电话返回北京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1966年5月16日，以中共中央发出的这个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北京乱了，全国乱了，人心也乱了。

北京的不少大学相继出现了乱揪乱斗的现象。6月初，在京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照以往的经验，决定向首都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力图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党的领导轨道。

派进工作组的做法，对稳定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蛊惑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路线”。接着，他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迫检查，并在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

这时，子女们都遭到株连，被赶出了中南海。大儿子邓朴方的处境最为悲惨，他在北京大学被关押期间，不甘受辱，以命抗争，坠楼致残，后几经辗转，沦落到北京的清河福利院。

邓朴方并不知道，当他在福利院里度日如年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开了北京。

1969年10月的一天，一架军用专机载着65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由北京秘密飞往江西。

说来奇怪，在邓小平的一生中，有两次政治磨难都与他的祖居地江西有关。3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路线打成“毛派头头”，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这一次，他又被疏散到这里。

（程惠远 原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时间是1969年的10月。10月18日上午8点，总理办公室给我们核心小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总理讲，中央已经定了，邓小平夫妇到你们江西去，到那里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参加些适当的劳动。这些同志下去以后，年纪都大了，到南方去以后，气候又不适应，有没有暖气呀，房费不要收太高，对

他们生活要适当照顾。说明总理对老干部，原中央一些领导是很关心的。因为程世清同志讲，把小平同志安排在赣州，记录记载是这样。我向总理办公室汇报之后，总理指示不同意。感到放到赣州远了一点，在照顾，在管理，在其他方面都不方便，后来就选择在陆军学校。

离南昌市十多公里的新建县，有一个叫望城岗的地方，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步兵学校就设在这里。学校里有一幢两层小楼，是原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文革”期间，学校停办，人去楼空，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伯根就被安排住了进来。

当年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如今已改为新建县棉麻纺织厂。
安顿下来不久，邓小平和卓琳就被指定到这个厂参加劳动。

（罗朋原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党总支书记）

那原来是个拖拉机站，修理拖拉机的，后来改成个什么拖拉机修造厂，又修又造，挺滑稽的。但是工人都是挺好的。

从1969年11月9日开始，邓小平夫妇每天上午都要到工厂劳动近四个小时。这是他们当年劳动的车间，厂房依旧，如今里面却已完全变了模样。
这是邓小平当年用过的工作台和劳动工具。

（陶端缙 原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车间主任）

小平同志到这个厂参加劳动的时候，主要是做钳工。他主要于什么工作呢？这是拖拉机上的轮带螺丝，这个螺丝经过精加工以后，还有一个工序就是要锯掉一边，当时我们还没搞这个工序，小平同志正好在这里劳动，要用手工做一道工序。开始这个圆的，要经过手工锯掉一边，小平同志每天就于这个……

钳工，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老行当。50年以后，他重操旧业，依然驾轻就熟，干得有板有眼。

江西的冬天很冷。起初，邓小平去厂里劳动，走大路，要走将近一个小时，既劳累又不安全。工人们就在工厂的后墙开了一道小门，专供邓小平夫妇出入。从那以后，人们发现，每天清晨和中午，都有两位老人行进在这片田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踏出了一条坚实的小道。直到今天，这里的人们还称它为“邓小平小道”。在这条坎坷的小道上，邓小平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延伸出来的。

这里也有一条小道。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每天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在院内读书或种菜，晚上则沿着院内的小道走上几十圈。那时候，国家的政治经济每况愈下，他的沉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程红杏 原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工人）

有一次在车间里半途的时候他突然晕倒。晕倒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慌了，不知道他犯的什么病。后来卓琳找到我，她说，小程小程，你家里有白糖吗？她讲他吃了白糖一下子就会好的。我就直接跑到家里，泡了一杯白糖水，他喝了以后，就用拖拉机送到步校去了。

工人们就是用这台拖拉机把晕倒在车间的邓小平送回了住所。

很多年以后，卓琳代表他们全家给新建县拖拉机厂的工人们写了一封信，真诚感谢工人师傅们在三年中对他们夫妇的关心和照顾。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在中南海里采访了邓小平。华莱士：主任先生，刚才您谈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和您家人遭遇是如何的？邓小平：对那件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就是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

岁月艰难，邓小平在江西已劳动了将近两年。

1971年秋天，林彪垮台的消息传到了这里。邓小平夫妇获准和工人们一起去听传达。

（罗朋 原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党总支书记）

我进去的时候，传达文件的以前，看他坐得比较远一点，这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我就说坐前面点，坐前面点，你耳朵不好坐前面点，他就坐到前面来。他聚精会神地听，他听完以后还记不清楚，就要求把文件拿回去看一看。看了以后，那天晚上他们一家都很兴奋，在楼上气氛都不一样，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发出的一个声音：“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垮台，为逆境中的邓小平带来了转机。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带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追忆往事，毛泽东一一说了陈毅、刘伯承等开国元勋的战功，同时，也提到了邓小平，称赞他的才能。在场的周恩来当即嘱咐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1972年8月，邓小平上书毛泽东，恳切表示，希望能为党和国家再做几年工作。毛泽东很快作出批示，回顾和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未了还加上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当天就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应付“文革”的风风雨雨，周恩来早已身心交瘁，迫切希望邓小平能出来和他一道共撑危局。面对江青等人的百般阻挠，周恩来几经周折，终于叩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年4月12日，沉寂多年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宴会上露面了。一时间，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道，西方一家杂志还送给他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特鲁多加拿大前 总理）

记得在1979年，我有几个月下野了，那期间我又访问了中国，去了西藏。

从西藏回到北京后我见到邓小平。我问他，我现在下野了，但希望重返政治舞台，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说，只有一个：忍耐。所以我便练习忍耐，也重返了政坛。

（索尔萨芬兰前首相）

我们芬兰语中有个特别的词汇：忍耐。含意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个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当一位记者问及他的个人经历时，他幽默他说：“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

邓小平复出后，再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器重。

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召见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他把邓小平拉到自己的面前，宣布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一个星期以后，周恩来在病榻上亲笔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任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4月，中国决定派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将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坛。谁能担此重任呢？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邓小平是最佳人选。江青却极力反对，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向邓小平发难。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江青，说她是无理取闹。

4月6日清晨，邓小平登上了飞往纽约的专机。周恩来扶病前往机场为他送行。

（邓小平赴联大电影资料）

邓小平不负重托，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舆论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邓小平载誉归来，周恩来再次扶病前往机场迎接。

邓小平复出后，两位老战友心心相印，共撑危局，被“四人帮”视为眼中钉。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轰动一时的“风庆轮事件”。

1974年9月，国产万吨级轮船“风庆号”首次远航归来。“四人帮”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攻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周恩来和邓小平搞“洋奴哲学”。

10月17日，江青借口风庆轮有人散布对王洪文等人的不满情绪，大闹

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还强迫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针锋相对，明确表示，这件事要调查清楚。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

几年后，已成为阶下囚的王洪文在法庭上交代了这件事情。

（公审王洪文法庭证词资料）

王洪文：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

法官：你去长沙为什么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呢？这是谁的主意？

王洪文：这是江青的主意。

法官：为什么呢？

王洪文：实际上是怕邓小平同志先去在接待外宾的时候，把真相说明，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法官：王洪文，我问你，你去长沙诬告邓小平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没有听信“四人帮”的谗言。1974年底，他当着王洪文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比你强。”还把领导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托付给了邓小平。

（吴冷西 原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中央在1974年11月间就决定开四届人大，要开四届人大就要有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这个报告成为团结全党全国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从乱到治，四届人大是从乱到治的一个转折。所以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他一开始就抓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总理病重，所以毛主席确定只能在五千字以内，不能超过五千字，这是总理历届政府工作报告最短的一个。小平同志说：“你们写的时候不妨稍微多一点，将来定稿的时候可以删，但文字力求简洁，整个文章最后归结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要落到这个上头。”所以

小平同志主持这个报告，一是为这次人代会定了个基调。

第二，也是为他1975年一系列的调整工作做了一个舆论准备。从3月份开始，一系列的调整工作，就是依据这个报告来的。从这两点看，小平同志主持起草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带战略性的、很重要的一步棋。

1975年1月，中国政坛好戏连台。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开幕那天，周恩来带病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

我现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我只念头尾两段，好在今天正式文本已经印给

各位代表了……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不久，周恩来又致信党中央，建议在他住院治疗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次辉煌。他实际上同时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就在这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项指示，邓小平抓住契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义无反顾地发起了一场全面整顿。

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的干部大会上发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号召。

（王平 原中顾委常委）

他那时候，首先一条，他是抓军队，抓整顿军队。他说军队重要。1975年整顿，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恢复优良传统。他说，有人讲，雷锋叔叔不在了。他说这很值得注意。军队要听党的指挥，不能散。

经过九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已陷入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摆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乱摊子。

当时担任国务院生产组副组长的袁宝华告诉我们：

（袁宝华 原国家经委主任）

当时国务院成立了一个计划组，一个生产组。我就做生产组的副组长。生产组的组长是计委军代表。一天到晚就是搞生产调度。什么叫生产调度？就是救火队，哪个地方铁路断了，你赶紧想办法把铁路搞通。哪个地方没煤炭了，赶紧运煤去。上海电厂马上要“断炊”了，你赶紧在黄浦江口截一条油船，装原油到南京去炼油的，把它截过来拿到上海电厂去烧油，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别人就讲，你这件事情，是个泥瓦匠的工作，拆东墙补西墙。

邓小平选择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他点将由万里挂帅，还给了他一个“上方宝剑”，即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九号文件。3月5日，在九号文件发出的那天，邓小平把各省市主管工业的书记召集到北京，正式下达整顿的动员令。会前，当省委书记们争相与邓小平握手时，他突然一摆手，严肃他说：不握手了，现在工业形势很不好，等你们工作搞上去再握手吧。他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房维中原国家计委研究室负责人）

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从全国的大局讲到了铁路，进而讲到了解决铁路问题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必须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必须坚决反对派性。可以说，这次讲话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向闹派性的头头发

起了征讨。

徐州，是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主干线的中枢。“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夺了铁路分局的领导权，把市委也赶到了郊区。两个造反派组织互相争斗，使两条铁路陷于半瘫痪状态。

（任若奎 原徐州铁路分局党委书记）

当时说要整顿，我们都怀疑。怎么整顿？现在造反派头头在市革委会、铁路分局革委会都当了主要领导，怎么整顿法？产生了怀疑。可是没想到，万里部长带着中央九号文件来到了徐州。就在我们分局开了一个大会，原来想也就是两三千人，结果一万多人，都去参加。宣布了九号文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家热烈鼓掌，非常拥护。就在这个时候，又宣布逮捕造反派头头顾本华，大家更是振奋人心。经过一段整顿，很快就把津浦、陇海这两条大的干线恢复了通车。

铁路整顿初战告捷，经济整顿随即全面展开。

5 月间，邓小平再次把各省主管工业的书记召集到北京，重点解决钢铁工业整顿问题。他三次到会讲话，提出钢铁工业要上去，必须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鼓励各级领导要敢于抓生产，不要怕个人被打倒。这份会议记录告诉我们，邓小平还风趣他说：不要怕被人抓辫子，我这个人就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不要怕，整顿出了问题，我负责。

（袁宝华 原国家经委主任）

这个会议一结束，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讲话，也是马上发出去了一个中央 13 号文件，6 月份情况就发生了变化，6 月份这一个月，平均钢的日产量达到 72400 吨，这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大刀阔斧的整顿，受到“四人帮”的阻挠与攻击。早在 1 月末，姚文元就抛出了一篇重头文章，影射邓小平要刮“资产风”。4 月，张春桥又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由此掀起了一场批判“经验主义”的歪风。一时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成版累牍地发表文章，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整顿是因循守旧、复辟旧制度。

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做法，警告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

6 月，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邓小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严肃批评，迫使江青等人不得不写出书面检查，承认“四人帮”是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1975 年的夏天，整顿如火如荼。邓小平因势利导，又把整顿引向了“文革”的重灾区科技教育战线。

7 月间，他派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针对“四人帮”在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制造的混乱，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邓小平多次召集会议，讨论这份《汇报提纲》。他说：现在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不能把科技人员搞得灰溜溜的。不是把知识分子叫做“老九”吗？毛主席不是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谈话中，邓小平提到了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他说：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他应该爱护、赞扬。这期间北京大学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黄昆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的专长是搞半导体物理基础研究和理论教学的。在“文革”的后来，要我到车间里带学生搞半导体生产，这当然完全有可能发挥我的专长。这时候，科学院正好在那搞整顿，他们邀我去作一次学术报告，我作报告后，听说反映不错。后来我才听说，小平同志对这件事很关心，在听科学院汇报提纲时拍了桌子。他说，你们有个搞半导体的，叫黄昆，是个老科学家，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周荣鑫你查一查，我是三天前知道的。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分配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后来在1977年我就被中央调到半导体所工作了。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各行各业的形势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文艺界开始结束了样板戏长期独占舞台的局面。这时候，围绕着故事片《创业》的放映问题，发生一场尖锐的斗争。

（张天民电影《创业》编剧）

这就是我当时给小平同志和毛主席写信的原稿。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当时正处在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时期，这个整顿包括文艺界的整顿，而且这时候，毛主席已经对有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说文艺界没有文艺，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批评了文艺界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因为这个事积压了很长时间，江青给扣了十大罪状，我一直不满，所以写了这封信。小平同志看完这封信后，很快，大概就是第二天，就拿着我这封信转到毛主席那里去了，请毛主席看这封信。

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支持下，《创业》终于公开放映，党的文艺政策开始进行调整，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了。

（字幕：《海霞》、《乃水千山》、《长征组歌》）

全面整顿层层深入，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革命魄力和高屋建瓴的领导才能。这年8月，他又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三个文件，明确提出，整顿的核心是整顿党的组织，整顿党的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要求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人们发现，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谷牧 原国务院副总理）

这段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就是把“四人帮”搞乱了的的思想，搞乱

了的生产秩序，搞乱了的管理系统，把它恢复起来。没有明讲，实际上就是跟“四人帮”对着干。整顿的效果是很好的。要没有这个，后来的对外开放，开放什么？

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他们歪曲毛泽东关于《水游》的一次谈话，发起了一场别有用心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运动，对整顿施加压力。江青还跑到了大寨，公开宣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在1975年9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达到了高潮。

在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开幕式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要全面整顿的思想。

（贾长志 原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代表）

小平同志那一次讲话，大家反映非常好。我感受最深的，一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感受很深的，就是有两点，一个是他讲话讲到要强调农业基础的地位问题。他讲，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农业这个基础发展了，就会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前进。他又讲，现在全国部分的县、地区粮食的产量还赶不上解放初期。当时江青就立即插话，说那是个别地方。小平同志当时斩钉截铁他讲，个别地方也不行，说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当时小平同志讲得很严肃。另外呢，还有讲到政策上的问题，小平同志讲要退。退过去搞共产风的什么东西。江青当时也讲，那是值得研究的，就表示不赞成。那次小平同志讲话，江青几次插话，干扰。

全面整顿艰难曲折，成绩却显著辉煌。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创造了10年“文革”期间的最高水平。邓小平及其领导的整顿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也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感到极大的安慰。他在医院里对外宾说，现在邓副总理已经全面担负起责任。

（吴蔚然 原北京医院副院长）

1975年下半年，9月份的时候，周总理在305医院进行最后一次比较大的手术，虽然不是为了根治他的疾病，目的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那天手术，在总理已经用了麻醉前镇静药躺在平车上，我们把他慢慢地从走廊推到手术室去的过程中，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小平同志，都在走廊里头目送总理到手术室去。在平车将要到达手术室门口距离很近的时候，总理突然问：小平同志在吗？当时我们就赶快把这个话轻轻向后传过去。小平同志就过来，就俯卧在总理的头旁。总理就紧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很激动而且声音很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声音讲得很高，说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冷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

可以说，1975年的整顿，是我们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已经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贫穷的社会

主义”的谬论，坚决主张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实际上就是他后来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为全党的中心任务的思想。他当时还提出一些对外开放的思想，比如说他提出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设备，他当时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

是劳动者。这样看来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改革的一些重要措施，在 1975 年就已经酝酿了。所以小平同志自己讲：拨乱反正在 1975 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 1975 年试验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当时的名称叫做“整顿”。

1975 年的下半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四人帮”和毛远新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向他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内心非常矛盾。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11 月 20 日，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要求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伴随着初冬的风雪，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第六集

历史转折

（字幕：北京宽街）

从江西回来以后，邓小平一家再也没有搬回中南海。

1976年，就在这所临街的院子里，邓小平迎来了他的第六个本命年。这一年，是中国的龙年。

（邓小平）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比邓小平年长六岁，在巴黎相识后的五十多年里，他一直是邓小平最亲密的兄长。

周恩来的逝世，给复杂的中国政局留下了一串未知数。

（范硕《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

1976年总理逝世致悼词这个事，张春桥就提出来，张春桥说请叶帅来作。张春桥的本意是想他来作。结果叶帅说，我不能作，说邓小平来作最合适。请小平同志来作。后来江青、张春桥说那合适吗？叶帅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军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代理总理工作，为什么小平同志不合适？我作不合适，只有小平作合适，他说得很坚决。因为叶帅说小平作，他们就没办法了。

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

（邓小平）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这是1976年邓小平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十多天以后，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指定专管外交事务。

2月5日，王洪文在京西宾馆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传达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部署。

3月15日，《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实际上是讲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

“四人帮”的攻击，好像在人们没有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清明节前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自发地悼念周总理、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活动。

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

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天安门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四人帮”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指示他们的写作班子收集材料，罗织罪名，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和总指挥。

（吴小平）

我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我叫吴小平。在1976年4月7号的上午，王洪文、江青和张春桥，接见了姚文元带来的一帮子人。据说嘛，这帮子人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写作班子。他们来了之后呢，江青、王洪文和张春桥特别的高兴。江青呢，当时就叫了，说我们胜利了。王洪文接着就说，拿茅台酒来！

邓小平又一次陷入了政治困境。4月7日，在“四人帮”的蛊惑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字幕：乐交民巷）

撤销职务之后，邓小平在这里被监管了两个多月。

从高处看下去，可以发现，邓小平住的这个地方与天安门广场距离很近。

邓小平已经72岁了。在“四人帮”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政治生命也就自然地终结了。

那个多灾多难的龙年，使中国人遍尝了人间的苦涩与酸辛。

7月6日，共和国又一次降下了半旗。

新中国又一位开国元勋朱德元帅与世长辞。

7月28日，24万人在唐山的地震中失去了生命。但这并没有使正在深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断。

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撒手人寰。

巨星陨落，举国同悲。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却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活动。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

正是这些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们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

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这是一个令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欢庆的锣鼓，宣告了十年动乱的结束。

但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的命题不可回避地摆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拒绝。

这期间，邓小平正因病住在医院，不久，他的一家就被叶剑英安排搬到了北京郊区的西山。

（王守江原叶剑英办公室主任）

接到这儿来了以后，有一次中午的时候，叶帅到玉泉山5号楼，开了会以后，他叫我到我们秘书办公的地方来，后来他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

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想给他一套文件，中央确定了由你直接给他送，其他人不要进去了，住在哪个地方，其他人也不要告诉。中央办公厅直接写你的名字，你把这套文件直接转给他。这个楼是 25 号，当时我给他的这套文件，写我的名字，中央秘书局认为还是给我的这套文件，我就冒名的给小平同志，实际上是给小平同志的。叶帅很快就来看他。

冬去春来，龙年一过，老战友们之间的走动渐渐地多了起来。
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

十年动乱，使党和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怎样才能走出困境？首先必须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关系。但是，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却认为，要维护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毛泽东生前作出的一切决定和意见。这个错误思想，集中表现为这篇 1977 年 2 月 7 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凡是”。

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中国就不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境，邓小平就不能复出工作。“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抵制。

1977 年 3 月，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4 月 7 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三天后，他又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恰当，请将我的信转发全党。

5 月 24 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令全党同志耳目一新，拉开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序幕。

这时候，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深入思考中国的问题。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师在一家医院的走廊里为构思一篇理论文章绞尽了脑汁。

（胡福明原江苏省委党校校长）

那是 1977 年的 6 月下旬，“两个凡是”发表不久，我就在理论上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经常也修改自己的观点。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我一旦思想形成后，就着手考虑写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当时叫《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了（1977 年）9 月份，我就把文章寄给北京《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同志是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到了（1978 年）1 月份，就给我寄来了一份清样。到了 4 月份，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约我，他说，这篇文章很好，很重要，应该发表在第一版。但是，还要做一些修改。据我知道，为这篇文章做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都是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批判唯心论、

形而上学，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搞拨乱反正。

就在这期间，叶剑英迎来了他的八十寿辰。将帅们不约而同地相聚在叶帅家中。

（王守江原叶剑英办公室主任）

大伙都来了。首先来的是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带着家属、儿女、第三代孙子、孙女都来了。比如聂帅来的早了，杨成武，后来徐帅也来了。

小平同志讲，老师们都来了，叶帅就讲，那你是我们老师的领班。

7月30日，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

一个星期以前，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

这是一次轻松的亮相。看足球，是他一生的爱好。

邓小平的再度复出，引起了世界瞩目。新老朋友一见面少不了要询问他的经历，可他总是把话题更多的引向中国的实际问题。

（韩素音英籍作家）

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 STRAIGHT（直爽），很直的，也不大说客气的话，就握个手，马上就，四川人说，“开腔”，就讲起来，满肚子都是为中国，说，我们过去呀，有这些问题，没有搞得不好，现在有了经验，知道了怎么做。说50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适合于80年代，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两个月的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给他肉吃，但是他到了18岁，他要吃肉哇。这个问题呀，我们要看得清楚。

记者：他谈到自己的经历吗？

没有，他很少说自己，他只谈过大事，我觉得中国很幸福，有这么一个人，很实际，PRACTICAL就是说非常实际。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得更为实际。他说，坦率他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五十多年的革命经历，使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党内最富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复出伊始，他就向全党大声疾呼，当前特别重要的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邓小平一复出，就着手领导拨乱反正的工作。这段时间，他主动要求分

管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

有了这样的杰出人才，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拨乱反正，正是从科学、教育这两条战线首先开始的。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推翻了“四人帮”鼓吹的“两个估计”，倡导要在党内和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他要求教育部组织很强的班子来编写中小学教材，抓一批重点大学，尽快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的职称，恢复高校的招生制度。他说，拨乱反正，语言要准确，办事要快。这，正是他一贯的风格。在他的领导下，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了考试，他们中有许多人已过了而立之年。

1978年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

（邓小平）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

科学与知识又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

1978年5月11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反复推敲、修改，《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受到了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同志的压制。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指示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有的同志甚至指责这篇文章是反对毛主席的。一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蒙上了一层阴影。

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5月30日，他对一些同志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6月2日，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他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邓小平）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

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邓小平离开了北京。他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月，他又来到了广袤的松辽平原。他说，我这是到处点火。

（王恩茂原吉林省委书记）

我汇报以后，小平同志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讲话。小平同志提出来要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大问题。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老是很低，还很苦，我们对不起人民。所以，还是要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小平同志在吉林对我们所作的指示，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还是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的，这就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一个月后，邓小平又去了一趟日本。

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引起了邓小平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邓小平乘新干线高速列车）

邓：那是农民的宿舍吧？

答：普通的市民的房子。

问：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

邓：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高速列车终于在1978年的年底启动了。

（胡绳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这时候，党内党外，人们都纷纷地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示出了一种愿望，一种强烈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那种错误，要求摒弃过去那些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各种做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时候举行的。在这次全会前，还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同志就作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就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也就是为几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指导方针。在他的领导下，几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做出认真的改革，来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企业、劳动者个人的各个方面积极性，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那么，我们的国民经济就能够以高速度的稳定的向前发展。

（邓小平）

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从而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决定意义的一步。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些重要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胡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会议，叫做遵义会议，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可以说，跟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可以对比，可以相同。1935年遵义会议，是在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军队都处于非常困难艰难的时期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遵义会议只过了14年，中国革命就得到了辉煌的彻底的胜利。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在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中间，我们经历了各种挫折、曲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以后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胡絮青老舍夫人）

请坐，请坐，请坐。这就是老舍最后，1965年照的这最后一张照片。

“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

（胡絮青）

打得太不像话了，桌子上擦桌子，让他跪到上头。所以他说，士可杀，不可辱，与其成这样，还不如什么，我干干净净地死了，这么死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就拿着自己的订起来的毛主席的诗词走的。末了时候跟我这个孙女说，你说说跟爷爷再见。

1978年8月，胡絮青给中央写了这封信。几天后，邓小平在来信上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迅速作出结论，不可拖延”。

（胡絮青）

开会的时候呢，邓小平同志特意送的花圈。

爸，我在给您写信，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

爸，我永远不会忘记，1967年1月4日，同学们递给我一张《打倒陶铸》的传单，说您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978年12月，已故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曾经使许许多多的读者流下了动情的泪水。

“文化大革命”以后，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她和母亲奔波了两年。

（曾志陶铸夫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我就晓得他们比较好。所以我就敢去找他（邓小平）。找他嘛，去见了，后来我就给他讲陶铸的问题，他就听了，陶铸的问题他就听了。听了以后没表示态度，一点态度都没表示。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正式出来呀，他也不好怎么表示，虽然他兼了几职啊，他还没正式上任呢。可是我的女儿呢，陶斯亮呢，对这个事情，她就很着急。为什么小平同志一点不表示啊，这么冷淡啊？就感觉觉得很失望。后来，别人抄给我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是小平同志批的，他这么写的，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后来很快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女儿后来也说，小平同志很深沉啊，当时那个时候，他自己不能讲话，他一句话都不讲，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很干脆，马上就给你解决，所以最早平反的就是陶铸和彭老总嘛。

这些都是迟到的追悼会。

那两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这样的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在他的领导下，从1979年到1982年，全国有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1980年5月17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桩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

等到最后他跟我握手，小平同志跟我说了一句话：是好事，是胜利……

（邵华泽《人民日报》社社长）

人们很自然地就要去回顾这一段历史，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对待？就是说在解放思想这样个潮流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股这种思潮。就是怀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怀疑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再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怀疑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后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

针对在党内外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邓小平）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为了排除“左”和右的干扰，邓小平认为，必须作一个历史决议，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明确今后的前进方向。他高度重视这件大事，亲自主持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

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核心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记者奥利埃娜·法拉奇来到北京。邓小平连续两次接受这位以爱提尖锐问题闻名的女记者的采访。

采访一开始法拉奇就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邓小平）

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

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呀，要非常客观的，第一位是功，第二位才是过。把毛泽东思想里边许多好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下来。

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先后十多次召集历史决议起草组开会，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

（邵华泽《人民日报》社社长）

小平同志一开始就提出来，这个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说，要在重大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要统一认识，这是历史决议的首要的任务。他有一次甚至于讲了这个话，就说如果这个部分不写或写不好，那么，整个决议可以不要做。因为你讲“文化大革命”也好，你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好，那小平同志受的打击最大，我们经常讲这个，几次被打倒、被整，受的苦也最大。但是，他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来看这个问题，他从党的事业，从我们的历史，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所以他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须要否定，要坚决否定，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这一套。但是，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的一生。也不能说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就把

毛泽东思想完全抛弃。

（胡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起草小组曾经先后搞过十几个稿子，小平同志总感觉到不满意。不满意的中心一个关键问题，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站得高，从大局出发。他认为，我们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如果那样完全否定毛主席，那就实际上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历史决议》可以说是小平同志最重视的文件之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多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受这些错误思潮的干扰，这从根本上恐怕应该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有了这么一个《历史决议》作旗帜。所以江泽民同志说，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这件事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几十年来奋斗的历史，也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和党、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所以这是小平同志作出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万代的大事。

（邓小平）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经过 22 个月的起草工作之后，1981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江泽民）

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七集

绘制蓝图

（字幕：德国德累斯顿第十二届国际行动理事会）

1994年6月上旬，国际行动理事会第十二届年会在德国南部的德累斯顿举行。本片摄制组专程赴会采访。

这届国际行动理事会年会的议题是讨论世界经济转轨和南北差距问题。记者们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引起了与会政治家的广泛兴趣，邓小平的名字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被他们屡屡提及。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记者：为什么中国在会议中被屡屡提到？

答：第一，因为中国的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展幅度最大；第二，中国拥有12亿人口，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中国毫无疑问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瓦西里欧塞浦路斯前总统）

是他（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并且创造了我们有目共睹的经济奇迹。

（特鲁多加拿大前总理）

他（邓小平）有原则，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还把自己的原则投入到实践当中，他是个实干家，他追随自己的目标，并且认为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相同的目的地，那就是：中国的强大，中国的统一，中国的稳定。

（范·阿赫特荷兰前首相）

他（邓小平）是我当时所见过的最风趣、最充满活力、最具魅力的人之一。我并不想充当预言家，但当时我便认为，他是能改革中国，引导中国踏上新路程、新发展道路的人，而事实恰恰如此。

同邓小平的会见，给范·阿赫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1980年，中国刚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邓小平介绍了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初步设想，还说，为了寻找现代化道路，新中国的领导人已执着探索了30年。

（字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毛泽东）

准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字幕：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10年后，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字幕：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又一个10年过去了，周恩来扶病登上了四届人大的讲台。

（周恩来）

我现在作政府工作报告，请求大会讨论和批准。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薄一波原中顾委副主任）

毛主席是想迅速地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个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应该的。我们国家是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各方面都不行，应该改变。但是呀，他这个心情很急，没有步骤，也没有一个什么更高的理论，提出来的办法呢，就是搞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六千万人上山土法炼铜。这一条路一定，损失之大，那就不知道有多大了。长期以来没有恢复起来。这是探索中间的一种失误，探索还是对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又经历了两年徘徊。在急躁冒进的错误思想指导下，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提出要在本世纪末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求成，又一次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调。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才能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通衢大道呢？邓小平揭示了一条真理：

（邓小平）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1978年年底，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开始重新考虑经济发展战略。

1978年9月，邓小平会见了日本新闻界的一批客人。谈话中，他对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就是到这个世纪末，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们也还是不富，我们的水平比你们差得远。国际舆论认为，邓小平已经清醒地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

一个月后，邓小平应邀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访问。

（画外音）

日本原田外相走进机舱迎接。他对邓小平说：“你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人们发现，他以极大的兴趣参观工厂企业，考察日本经济。

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说：邓小平副总理的访问“宛如台风经过一样，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竹内实还说：“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从这种不同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在深入思考。”

（邓小平）

目前，我国人民正在执行新时期的总任务，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在日本众参两院议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前，邓小平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

在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制造厂，邓小平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从1978年10月起，邓小平频繁地出国访问考察。国门外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希望。

（邓小平）

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薄一波原中顾委副主任）

我们是耽误了时间，这20年时间“四小龙”上来了，其他国家都上来了，（相对地说）我们退了一步。如何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小平同志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道路找到了，叫做改革，叫做开放。

1979年7月，邓小平和家人来到了安徽南部的黄山脚下。这时候，山下广阔的农村正在躁动着改革的热潮。

好像为了证明什么，75岁的邓小平一定要亲自攀登这座高山奇峰。

（周爱义原安徽省委办公厅警卫处长）

小平同志和我们从观瀑楼过来以后，散步到这个地方。到这以后就准备上去。小平同志问这是什么地方？朱福生同志讲：这叫桃源亭。小平同志说这是指什么讲的，是不是指后面的桃花峰讲的？朱福生说：是，是指桃花峰讲的。小平同志到这个地方后一口气就上去了，这台阶还是比较陡的，他一口气就走上去了。在这里站了一会儿，小平同志问前面的高山是什么地方，我们就介绍，前面是天都峰，非常高。今天是有雾，看不清楚。在讲“山非常高”的时候，毛毛就讲，哟，山这么高，爸爸，我们明天能上得去？小平同志听了后，笑了笑，说：气可鼓，不可泄，明天我们一定要上去！

（朱福生原黄山旅游局局长）

当时在这个地方上山的时候，大家都跟他说，邓老，这一段比较陡，你是不是坐一段抬子（滑竿）。他说，不要，坐什么抬子嘛。他说，爬山就爬山嘛，爬山哪，有一条经验，把裤管一定要卷上来，卷到膝盖上边来，这样走起路来就比较利索。他一边说护士就帮他卷，他自个儿也卷。他这一卷，我们工作人员就随着他，也把（裤管）卷起来。看到我们都卷了，很多游客也都卷起来。这样，沿着这条路上来的游客绝大部分都把裤管卷了起来。

邓小平徒步登上了黄山光明顶，云海和奇松之下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邓小平）

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现在全国人口有 9 亿，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王光宇原安徽省委副书记）

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常委同志都来欢迎他。当时我们说，小平同志，你爬了几天很累了

吧？他就很高兴他讲，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小平同志上午下山，下午 3 点后就接见我们省委常委。在这个接见当中，小平同志作了很重要的一系列的指示。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小平同志要我们解放思想，要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发展山区经济，发展黄山的旅游事业。要增加山区人民的收入，改善山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个地区可以先富起来，一部分人也可以先富起来。要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下了黄山，邓小平又去了上海，去了山东，去了天津。一路上，他掰着手指和当地省市领导算经济发展帐。

（字幕：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带着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新鲜感受，邓小平回到了北京。10 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大口，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提法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1979 年 12 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大平正芳是著名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专家。60 年代初，他所设计的日本经济发展十年倍增规划实施成功，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平正芳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回答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算个小康水平。

从此，小康目标，这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几十年的新概念就提了出来。

（孔令朋 孔子第 76 世孙、上海外贸学院教授）

小康这个词，据我了解，是出自于《礼记》这本书上的《礼运篇》。它是描述西周初期的社会景象。孔子要把这个社会作为他的理想社会，所以终

生作此追求。小康是他的初级的理想社会，他最高的境界是“大同”。自从孔子提出小康概念，历经两千多年到今天，没有一个朝代能实现真正的小康。

（王梦奎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根据我学习小平同志著作的体会，他的所谓“小康”，就是温饱到现代化的中间阶段。用他的说法就是不富裕，日子好过，但是还不富裕。就是不穷不富这么一个阶段，或者也可以说是温饱有余，而富裕不足的阶段。这个阶段将会延续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到实现现代化为止。那么小平同志对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本世纪末的发展目标，他有多种提法，比如说“实现小康”，比如说“翻两番”，就是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比如说“人均八百美元”。我认为这三个提法实际上是一回事。

提出小康目标，实际上是对过去设想的“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作了重要修改。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把本世纪末实现“小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此，中国老百姓体会自己的生活，就有了一个亲近朴实的说法。

（字幕：安徽省繁昌县江南第一茶市）

（农民）

“小康”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搞得好，吃的不愁，吃得也好，穿的也不错，做生意嘛，就是搞得活跃。

记者：你过去家里是做什么的？

答：过去种田的。

记者：过去不敢卖茶叶吧？

答：过去哪敢呢！现在我胆子大了，人人胆子大了，思想开放。

记者：是胆子大了，还是政策好了？

答：是政策好！政策好胆子就大了。

记者：你卖一个瓶子一块钱，一个塑料袋多少钱？答：一个塑料袋五分。

记者：像这样一天下来，你能挣多少钱？答：能够挣100元。

记者：一天100元，那一年呢？

答：一年就可以计算了嘛。

记者：你过去在家里是做什么的？

答：过去我上班，在单位上的，现在不上班了，搞个体了。

记者：你现在收入好了，家里就……

答：家里就富裕了嘛。

记者：吃不愁了，穿呢？

答：穿也不愁。

记者：你家达到“小康”没有？

答：达到“小康”啦。

记者：你懂得“小康”的意思吗？

答：就是生活过得好呗！

（字幕：苏州）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983年2月，就在党的十二大正式确定小康目标后不久，邓小平来到苏杭地区，他要在这个比较富裕的地方，验证一下小康目标合不合实际。

（戴心思原苏州地委书记）

小平同志到苏州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那个时候，苏州和全国一样，大家都在议论“翻两番、奔小康”的问题。那个时候一谈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十二大刚刚开过，小平同志对江苏和苏州这个地方，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翻两番，什么时候能够奔上小康。他很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他问现在苏州农村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子？你们对“翻两番”有没有信心。因为当时有一种议论，好像基础差的地方翻番比较容易，因为基数低，翻番比较容易。基础好的地方，好像块头大，翻番比较难。当时江苏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我们苏州市呀、地区呀，我们的一致看法，就觉得不一定。可能基础好的地方翻番比较快。因此当时我们就估计苏州这个地方，翻两番肯定不要到2000年。

离开苏州，邓小平又来到了杭州。

（铁瑛原浙江省委书记）

他来么，一是好多年没到杭州来过年，一个是在这儿过年。另外主要是想在这里研究一下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达到翻两番，怎么样个翻法。他说，我在苏州，苏州的同志、江苏的同志向我汇报了一下，说他们（苏州市）现在已经接近八百个美金，浙江当时是3800万人口，我们全省的平均，给他算了算，达到450个美金，我们说可以翻，不但可以翻两番，而且还可以……当时没敢多说，至少可以翻两番半。他听了以后很高兴，而且他讲，江苏、浙江恐怕是要多翻一点，不止翻两番，要多翻一点。因为什么呢？宁夏、青海、甘肃这些地方比较后进，如果江苏、浙江只翻两番，他们怎么办？意思是达不到。他就让我们要多翻一点，这样可以拉到翻两番，全国翻两番。

苏杭农村的巨大变化，使邓小平对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充满了信心。在返京的列车上，有人问他感受如何，邓小平高兴地说：到处喜气洋洋。

（字幕：1984年国庆节）

（邓小平）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小康目标切实可行；实践的发展又促使邓小平考虑中国未来更长远的奋斗目标。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一行。这时，提出小康目标已经过去了七年，格拉称赞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

（邓小平）

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在同格拉的会晤中，邓小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描绘了从新中国成立到下个世纪中叶一百年间中华民族的复兴蓝图。他说，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半年后，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百年图强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得到了全党的确认。这就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李鹏国务院总理）

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也就是说，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然后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再用 30 年到 50 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是按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这样就为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奋斗目标，有强大的凝聚力，有具体实现的目标，也鼓舞了大家的斗志。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 90 年代后期，这就是在中国即将完成第八个五年计划，要实现“九五”，到“九五”要基本实现小康。当然，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还不平衡，还有八千万左右的人民还没有脱贫。但是从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我们经过努力，用五年的时间，达到全国基本上达到“小康”的水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想，小平同志提出的这样一个三步走的战略方针，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高瞻远瞩的，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也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1989 年的植树节，邓小平在北京亚运村工地移植了一棵有 40 年树龄的松树。40 年的岁月，正是新中国已经走过的历程。挺立的松树，让人们感受着绿色的未来。在邓小平的设计中，中国的明天将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

（邓小平）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来了。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逢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精神文明建设，它本来就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讲社会主义优越性，它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文明方面，还表现在精神文明方面。所以小平同志讲，两个文明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在规划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抓精神文明建设要狠狠地抓，一天也不放松地抓，要从具体事情抓起。他还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那么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所以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小平同志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现代化，是中华民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强调，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逐步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问题。

也许，再过几十年，中国的农村很多能像江苏省的华西村一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的农民富了，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帮助贫穷落后的地区。在华西村，我们摄制组碰巧赶上——对新人的婚礼。

新娘是本村人，在外村工作。

新郎是外村人，娶了华西村的姑娘。

（访新郎）

记者：你是哪个村的？

新郎：我是前进村的。

记者：离这儿有多远？

新郎：离这儿大概有一公里路吧。

记者：你们村的经济状况跟这儿相比，怎么样？

新郎：明显不如这里。

记者：你能不能讲讲，你跟华西村的新娘是怎么认识的？

新郎：我们同厂，同一个厂。

（华西村村民）

因为前进村的经济条件比较差，所以我们华西为周围帮了五个村，有前进村、华民村、向阳村、三茅阳村、泾浜村一共是五个村。前进村我们办了一个化工厂。我们这个新娘就是派到化工厂工作。和前进村的那个男青年爱上了，就嫁到前进村去了。帮助他们富起来。记者：现在你们帮助他们富起来这种情况，除了本地周围的几个村外，外地的还有吗？

村民：有，我们还要到中西部去，陕、甘、宁、晋地区。

记者：你们帮的形式有些什么？

村民：有经济方面的，有给他们培养人才的，都有。

我们周围呢，主要是经济帮助。像中西部地区呢，我们主要是给他们培养人才，经营人才，管理人才。我们最近办了一个培训班。就是培训陕、甘、宁、晋 100 个乡党委书记。来了以后，第一个阶段两个月，让他们了解华西，让他们知道华西创业的经历。然后再两个月，让他们跟着我们的供销员出去搞营销。最后两个月，让他们在我们的工厂担任一定的实职。我们主要是培养他们经营管理方面的能力。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问邓小平：

华莱士：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很惊讶，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优先发展科学教育，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是邓小平日夜牵挂的大事。

（邓小平）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邓小平接见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等著名科学家。

（李政道 美籍物理学家）

我想小平先生他是了解中国要有前途，就必须要有发展。可是我们现在是站在高科技的社会里，所以没有高科技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社会是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

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来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工程的奠基石培了土。

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世界高科技项目。一位欧洲科学家问邓小平，你们现在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邓小平回答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四年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建造成功，邓小平又一次来到这里，仔细地参观了全部的实验设备。

（邓小平）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落后，必须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搞这个工程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邓小平还说：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李政道 美籍物理学家）

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现在不光是“一席之

地”，在这个领域里，是全世界公认，中国是第一。

1986年3月，北京的几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关于跟踪高科技发展的建议，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当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断。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随后，中央很快拨出专款，批准实施了简称“863计划”的《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邓小平亲笔为这个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字幕：1988年邓小平在北戴河接见科学家）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小平同志在跟捷克总统谈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讲的，这完全对，但是，这还不够，依我看是第一生产力。这样就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性质确定了，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了，提出了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这是新命题，不仅仅重申马克思的观点，既重申他的观点，又发展他的观点。我想除了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科学发展，研究了二次大战以后的发展，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研究了我国国家科技的发展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差距拉开的背景。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地位上，是对现代生产力新的观察和概括，也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观察和新的概括。我们讲社会主义，在当代条件下讲社会主义，如果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两种时代潮流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邓小平）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

1983年国庆节，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北京的后圆恩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我们还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徐永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在1992年我们掀起了一个“希望工程”百万献爱心活动。在这个活动最高潮的时候，是在6月10日那一天。基金会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捐款室，来了两个军人，他们拿出了3000块钱的捐款交给我们的捐款接待员，后来我们说要登记捐款人的名字，两位军人讲，这个是有纪律的，不能公开这位捐款人的名字，如果你们一定要写名字的话，那么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10月6日那一天，又来了两位工作人员，用同样的方式又捐了2000块钱，后来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调查，最后终于知道这是小平同志的捐款，所以我们

就把小平同志这 5000 元的捐款，全部用到他过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就是广西的百色地区。

邓小平的捐款转到了广西平果县的希望小学，受到资助重新背起书包的孩子们，给邓爷爷写了一封信。

（童声，旁白）

敬爱的邓爷爷：

您好！我们是百色地区平果县希望小学的学生，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献了 5000 元钱，又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都激动得哭了。

第八集

新的革命

（字幕： 1992 年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邓小平）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资本主义发展好多年了，几百年吧，我们才多长时间？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相貌完全不同，再耽误不得了。

（字幕： 1992 年邓小平在珠海亚洲仿真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邓小平）是时候了，不能等了。

1992 年的春天，这位 88 岁的老人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城市里反反复复他讲述着这些道理。他领导中国走上了改革的道路，人们都称他是改革的总设计师。

十几年过去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历史是最好的回答。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曾取得过成功的经验，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自 50 年代后期起，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我们曾经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耽误了 20 年的时间。

（吴庭美 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

1956 年到 1978 年，我们这么一个农业县，一百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力，卖给国家粮食 9 亿 6000 万斤。但是吃国家的回销粮，吃了 13 亿 4000 万斤。就是这么一个一百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动力，22 年，没给国家贡献一斤粮食，倒吃国家四亿斤粮食。

1978 年以前，像凤阳这样的贫困县，在中国并不少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30 年的艰辛探索，当我们掌握了这些真理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曾经在建国初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改革，作为急迫的历史任务，就这样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1978 年 12 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果敢地发起了一场新的革命。

（邓小平）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在全国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

1979年，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们迎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大丰收。那一年，小岗人把他们的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2万斤。那一年，小岗人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家家户户的囤也装满了粮食。

（王昌太 原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

并不是中国农民不勤劳，生产不出来粮食。也不是中国农民没有创造性，找不到多增产粮食的道路，不是这个问题。根本问题在，解放以后的近30年间，有两个禁区没有被冲破，第一个禁区就是一个“包”字。一讲到“包”字，那就害怕，“包”字就是跟社会主义相对抗的资本主义道路，“包”字就是对阶级斗争的否定。另一个禁区，就是所有制，所有制一大二公，越公越好，越大越好。所以这两个禁区，实际上是1978年，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这两个禁区才真正地被冲破。

小岗村农民的突破，几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他们在严俊昌、严宏昌和严立学的带领下，冒着风险，悄悄地实行一种叫做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严宏昌 原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当时考虑，如果是公开地干起来，肯定干不成。所以，我们要保住这条秘密，要瞒上不瞒下。就是我们本队里不能瞒。当时，我们队是20户，115人。那时有两户单身汉，18户在家的。我们就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就是先不声不响地把生产搞起来。

包干到户，在当时被看成是历史的倒退，18户农民订下了这份契约，谁也不允许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农民们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万里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78年是大旱，大旱之年，我到了肥西看看。它那儿山南包产到户了，麦子很好。到了山南，我就表扬了他们，我说你们就这样干吧。那时候省委回来我就开会，我支持。县委就批评，批评他们，你们包产到户不行。所以那个时候起，我说这个问题，包产到户既不合党的决议，又不合宪法，宪法（规定是）人民公社嘛。开始搞了以后，我说怎么办？我首先跟陈云同志商量的，我说我那儿已经搞起来了，他当时在人大大会堂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主席团，休息时我到 he 那里，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双手赞成。以后我跟小平同志讲，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于下去。

有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万里心里有了底。1979年夏天，他专程去了一

趟凤阳。就是在这个时候，小岗人分田的事情传了出来，惊动了县上。

（徐万里 原凤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正在犹豫的时候，万里来了，管了，管用了。万里来后，陈庭元同志就给他汇报了，我们全县责任制怎么安排的，但唯独这个小岗生产队，它就是暗地里到户。万里同志问，那到户怎么样呢？他说到户当然好了，（粮食产量）三万多斤一下搞到12万。万里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就让它干去了。就这解决问题了，当时县里研究，跟张伯乐同志讲，你只能干这个队啊，别的队不能干，只能干小岗队，别的队无论如何不能干啊。好，就这样定下来了，就小岗生产队定下来了。哪知道到1979年年底，全公社都是这样了。

很快，全国都知道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1979年，《人民日报》开辟专栏讨论“大包干”的做法，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更多的人在犹豫观望。农村改革步履艰难。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王郁昭原安徽滁县地委书记）

1980年，在这一年的6月初，省委在巢湖召开了芜湖地委和巢湖地委和滁县地委三个地委的书记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省委负责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篇文件讲，就说安徽的肥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结果增产幅度很大。另外又讲到凤阳，就是“凤阳花鼓”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部分的生产队，都搞了包干到户，结果一年大变样。当时我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抄，我叫秘书就抄下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当天晚上下大雨，我连夜坐着汽车就回来了，回到滁县。第二天我就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了，我就把这个精神，邓小平同志讲话这个精神，进行了传达。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这次《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对于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他的倡导下，四个月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纪要提出要支持群众包产到户的要求，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从此，农村改革由局部试验进入到全面推广阶段。

（李锦 新华社记者）

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幅照片了。照片170~一国是1982年12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拍的。当时12月24号我正在商河县，鲁西北的商河县，就是这个地方，正在采访。突然接到新华总社的电话，说穆青同志让到北京来。31号这一天，在北大厅，万里同志他把我领到小平同志

面前，说 he 去过二百多个村庄。小平同志说，那你有发言权呐，小平同志说，农村情况怎么样你讲一下。当时很激动，一下子又想不出什么话来，万里同志就说，你就说说农民现在吃多少肉吧。我说，一个星期买一次肉，一大锅煮着，买个五六斤。一般下次再赶集的时候，一般就是五天，再去买一次。以后小平同志又问，说农民的房子怎么样？我说，一般都盖五间房子，三间正房，两间偏房。小平同志听的时候非常认真，耳朵都是侧着，很专注地在听着，我当时就讲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小平同志连声说，好，好，好。

农村改革方兴未艾，四川盆地又出了一件新鲜事。

（杨超原四川省委书记）

拿我们四川来说，主要是广汉。农业改革从实际出发，特别是向阳公社，它就那时把公社取消了，第一次出现了乡政权，恢复了乡的组织。

（钟汉银原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办公室主任）

全部变了，盖了办公大楼了。当时我们公社的大门是两扇，木板门。牌子在这儿挂着。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这几个字比较大。

记者：当时你们把牌子摘下来怎么没想到把牌子再留起来呢？将来是个文物啊，搞不好。

（李万贵原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书记）

当时我们就没有认识到那个嘛，我们只认为，名符其实，是人民公社就是人民公社，是乡人民政府就是乡人民政府，就没有考虑到其他的東西。

记者：当时是，好像是悄悄摘下来的，是吧？

李万贵：还是怕，当时我们上面还有个要求，先让你是改革、探讨，还规定了三个东西，不广播，不登报，不宣传，意思是搞坏了，烂嘛只烂我们一家嘛，搞好了嘛，将来有推广价值，再推广嘛。

从 1982 年到 1986 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到了 1984 年，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废除，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新体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温饱，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社会基本问题，经过短短几年的改革，就得到了初步解决。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蓬勃兴起，迅速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产业。邓小平高兴地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最大收获。

（邓小平）

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三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

1984 年，经过六年的实践之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已经酝酿成熟。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镜头。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国庆节。

（邓小平）

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1984年10月20日，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新闻解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迈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关键性一步。以此为标志，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持续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不久，中共中央又相继推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并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邓小平说：

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郑必坚 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小平同志这段话很短，很朴实，很通俗，但是你看，是非常之深刻而且严密。我们就是要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上面来寻找我们自己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就是解放生产力，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叫做什么呢？叫做第二次革命。这个革命要长期进行下去，进行到什么程度呢？要进行到下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界限要搞清楚。一方面，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曲折、失误，就认为连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都可以不要。另一方面，又不能够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切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如果这样认为，那我们就没有改革了，就会拒绝改革，就僵化了。所以，对这两方面错误倾向都要划清界限。

邓颖超：我们三个人同一年。

邓小平：同一年，你两个哪个大？你比我大两个月？

邓颖超：我比你大四个月吧？

邓小平：四个月呀，我是8月。

邓颖超：你是8月啊，我是2月。

邓小平：2月，那大半年呢，你呢？

陈云：我6月。

邓小平：啊？6月？

陈云：6月。

邓小平：6月，他居中，那还是她大。

领导改革的政治家也有轻松的时候。

全方位的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我们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和全党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实践和不断涌现的新鲜经验，向传统的观念发起了挑战。

（苏星中央党校副校长）

所以当时面临着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摆在我们现实经济生活的面前。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1979年，邓小平在与美国学者吉布尼的会谈中，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次谈话，虽然还是讲计划经济为主，但邓小平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1984年，为了适应全面改革的需要，中共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邓小平称赞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邓小平）

这次中央全会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好文件，我完全同意。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

（苏星）

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里边就有一条，就是我们的政府原则上不直接管理企业。这个是非常对的。再一个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中心环节还是搞活国有企业。因为现在你说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这它都是跟市场适应的，它都是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那么不适应的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它长期是计划经济在那里管着。这其他的经济成分是轻装前进，国有企业是背着个包袱走向市场。

（鞍山钢铁公司）

怎样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尖端课题。

（吴溪淳冶金部副部长兼鞍钢党委书记）

鞍钢是我们国家最大最老的一个钢铁企业，特别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一种体制就是缺乏企业自己造血的功能。鞍钢过去是皇帝女儿不愁

嫁，在计划经济体制情况下，鞍钢的钢材，一个是价格低，因为国家定价，价格低，再一个呢，当时市场上是供不应求。

（刘玠鞍钢总经理）

现在是面对国内外两方面的竞争，国际上产品现在通过各种渠道也进到国内来了，我们要和他们竞争，同时我们还要跟国内的先进的企业竞争。

（吴溪淳）

在这个情况下，用户有了选择，他们要选择物美价廉的。要物美就得质量好。价廉呢，企业必须得成本低，你才能价廉，否则你就亏本。

鞍钢人不会忘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来到这里，和工人们一起探讨国有企业怎样才能走向市场的问题。

（夏云志原鞍钢炼铁厂厂长）

在1978年9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我厂来视察。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厂生产情况。那一年厂的产量大概年产640万吨，有10座高炉。小平同志一听说有10座高炉，就问了一下，你这高炉装备水平怎么样？我说那可不行，破的破，老的老，有的炉子甚至是伪满留下的老炉子。

（吴溪淳）

当时小平同志就明确地指出来，我们要用先进的技术装备企业，引进技术要高起点，不能修修补补，不要改良，总得来讲要革命。那个时候，小平同志是看到了的。1978年他来讲，他是看到这个趋势的，就告诫我们，一定要注意高起点，要高起点以后企业才能有高效益，才能够真正进入市场。

（刘玠）

我觉得这样一搞呢，使我们这样一个国有大型企业，不仅在市场经济当中能够生存，而且我们能够得到发展。所以我们感觉到，小平同志指出的这样一个方向，只要这样走下去，国有大中型企业完全有希望。

（长春一汽）

在这个曾经生产出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老企业里，希望已经成了现实。

（耿昭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

我们一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汽人早就有过两个愿望，或者说有两个梦。一个呢，我们想实现换型的梦，就是摘掉30年一贯制的帽子。还有一个梦，就是建设大规模的轿车基地。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这仅仅是梦。只是到了市场经济，推进市场经济以后，也才有了这个条件，使我们这两个梦变成了现实。我们也实现换型了，老解放也变了新解放了，也实现建设建成了大规模的轿车工业的基地了。

只有走向市场，经济才充满生机，只有赢得竞争，企业才充满活力。这是每一个成功企业的共识。

（宣中光扬子集团董事长）

因为现在国家把责权利都放给你了，由你自己去决策、去经营去，市场的竞争，推动一个民族的进步，推动一个国家的进步，推动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

（迟斌元珠海生化制药厂厂长）

确实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厂的这么多科研人员，像这么一个环境，有充足的图书资料，有充足的科研基金，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字幕： 1986年11月14日人民大会堂）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从电视屏幕上，人们看到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了一份小礼物。对此，《朝日新闻》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评论，称邓小平的这一举动是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信号。因为邓小平送给客人的是两个月前在上海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刚刚上市的新中国的第一份股票。

（黄贵显 原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总经济师）

后来他们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展览了好久一段时间。当然我们搞证券的时候一直有一些压力的，就是这个不批那个不批。小平同志送证券给范尔霖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认可而且把我们发的（证券）送给（外宾），那我们就放心了。当时呢，我们只是想搞一个长期的资金市场。1986年9月26日，搞股票买卖的那个过程，是江泽民同志直接抓的，开了一些座谈会，就问了我们为什么搞不起来？我们就谈了这个批，那个不行，那个又不许。他就说为什么搞一些改革你们就这么困难呢？他支持嘛，当然其他都开绿灯了。

（字幕：上海）

（吴邦国 国务院副总理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小平同志对上海的市场的培育是很关心的，因为企业的改革，就是把企业推向市场。市场经济嘛，就是在资源的配置，要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这样，培育和发展市场，是目前改革的主要的内容。这个市场主要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当然有商品市场。我们的一种想法是，上海能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的集散地，所以按照这个规律和要求，上海就积极地、比较谨慎地、而且规范化地、逐步在探讨一个资本市场，一个证券交易所，另外生产资料的市场，包括有色金属交易所等等。另外还有技术市场，上海的技术市场也蛮活跃的，另外还有人才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积极地培育市场。这个发展以后，实际上为上海的企业的改革，面向市场创造条件。也为上海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一点的，资金和物资的一个宏观的环境和条件。

改革是一场巨大的试验。邓小平的观点是，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于是，证券、股份制、金融市场、

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原来被视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刺激着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争论的症结，还是计划与市场这个老问题。

1987年2月，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对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字幕： 1987年10月25日）

（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同时，根据邓小平的思路，大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决走不再提以计划经济为主了。这些重要提法，使我们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又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这次大会深入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和长期目标。邓小平身体力行，在这次大会上坚持退出了中央委员会。

十三大以后，中国的改革驶出了相对平静的内河，进入了最为复杂的攻坚阶段。

邓小平常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改革的艰难。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每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伴随着风风雨雨，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事关改革成败的大局。在坚持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

1989年的春天，北京很不平静。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遥相呼应，活动频繁。充满希望的改革大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邓小平发出了警告。2月26日，他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离开中国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3月4日，他再次告诫中央负责同志：“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但是，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波还是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发生了。它严重地破坏了改革的进程。

风波之后，改革将如何发展？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身上。

（字幕： 1989年6月9日）

（邓小平）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怎么样做工作，也还要来

的，迟早问题，大小问题。一看就明白是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主要是两个，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所谓共和国。也许这么一件坏事，会使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步子前进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能够发扬得更好。为什么讲这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是不是因为这次动乱，这10年就发生问题，正确性发生问题，正不正确？这10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制订的，包括三中全会以来制订的发展的三部曲，正不正确？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右，是不是“左”的问题？我想我们没有作出一种“左”的判断，也没有提出过急的目标。因此第一个问题要回答的，我们制定的战略日标，现在至少不能说它是失败的。

邓小平说：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

（邓小平）

但是今天回头一看，我们这方面就显得明显的不足。两只手，一只手比较硬，一只手比较软。总结经验，我想恐怕是这样，不是对不对，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邓小平说：这是总结我们过去10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邓小平）

我提出这么一个课题，利用这个时候，冷静地考虑过去，考虑未来。过去主要是过去10年，未来是一直到四个现代化目标实现。总结经验，我们有哪些失误，纠正；哪些方面搞得对的，坚持；哪些方面搞得不足的，加点劲。

那一年的夏天，邓小平照例去了海边。
他已经85岁了。

（邓小平接见李政道）

邓楠：每天游一个多小时。

邓小平：一个小时，在水下。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活动范围大小，喜欢大自然，自由一些，有个气势。

那一年的秋天，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坚持辞去了最后一个领导职务。

邓小平退休了，但是他仍然牵挂着改革，关注着改革的每一个最新动态。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治理整顿中逐步深化。形

势的发展，对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了紧迫的要求。改革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李铁映 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

但是毕竟改革深入到这种程度，还没有一个最终的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设想、蓝图或者规划。历史的任务也就提出来了，改革进入到这一步，需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 1992 年初又出来进一步讲了计划和市场。

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从 1979 年到 1992 年，邓小平先后十多次论述了计划与市场问题，这次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使全党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江泽民）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4 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结束的时候，邓小平来到了会场。

第九集

走向世界

（字幕：1979年1月28日美国华盛顿）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出国正式访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这一天，正好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舆论认为，邓小平选择新年的头一天飞洋过海，对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是件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字幕：1月29日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

主人与客人都显得十分惬意，这是一个政治的抒情之夜。

美国总统卡特说，邓小平的来访，对中美两国来说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美国政府租用了两架大型客机供记者们跟踪报道邓小平的访美活动。

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邓小平，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容大度地体会着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

（字幕：1月31日接受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字幕：2月3日波音飞机公司）

邓小平说：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他的官邸看到邓小平访美的电视报道后说：我感到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

1978年邓小平连续出访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邓小平）

目前，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代表团的成员中除国家部委有关人员外，不少是沿海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名义是礼节性访问，实际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

（谷牧 原国务院副总理）

我走之前小平同志找我谈过话，鼓励我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

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王全国 原中共广东省副书记）

因为资本主义二次大战以后，它把二次大战当中一些高、精技术，转为民用了，同时，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矛盾、弊端，也借鉴了社会主义的好东西，所以从50年代的后期到70年代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来了个大发展。一到外面一看呐，思想豁然开朗。访问回来了以后，又用了大半个月时间，在北京，我们就集体在那里总结。总结以后，向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整整地汇报了一天。

走向世界，不光是出去看，还要出去学。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作出决策：大量派遣留学生。

（李琦 原教育部副部长）

特别是那个时候，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两年。思想上的束缚，应该说还是非常严重的，对资本主义国家，那确实就是你说的。一想，哎哟，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这就不得了。在1978年的6月23号，小平同志作了一个著名的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在这个讲话里头，小平同志就曾经讲，他说，你们不要怕派出去，回不来，他说派出去一千个人，跑一百个人，还有九百个人嘛。不过才跑十分之一嘛，怕什么呢，他说不要怕。他说你们要大胆地派，不是派三个、五个，而是要成千上万地派。要学人家的所长，不要怕。

出去的管理，也要改善，不要怕跟人家搞到一起，这样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在这方面多花一点钱，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值得的。

（字幕：中南海怀仁堂）

1979年4月5日，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副书记王全国到这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消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把国民经济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王全国原中共广东省副书记）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我作了三次发言。4月10号那次发言当中，我讲了今年1月，小平同志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特别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觉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特别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我们就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来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根据这个发言，最后作为中南组，也作为广东要向中央常委汇报。我就把我这几次发言，归纳了若干条。就是在给常委汇报以后，习仲勋同志又带着这个意见，给小平同志汇报，就讲到，广东提出来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嘛，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原话这样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当时的原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五月份就由谷牧同志他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一个工作组，来帮助广东一块儿起草文件。我们一直到6月6号，然后到福

建，福建就根据广东的报告，他们也起草个报告，然后谷牧同志就带到北京，中央很快就批了，中发[1979] 50号文件。

文件里写得非常明确，“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对外开放，就这样，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和珠海，撕开了第一道口子。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梁灵光）

我想首先补充一个问题，就是1980年11月，中央确定了习仲勋跟杨尚昆同志调回北京，确定任仲夷跟我来接替他们两位的工作。我们来之前，11月，我们8号离开的，11月初吧，我跟任仲夷两个人去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对我们来这里给予一些鼓励，但是他反复讲了两次，这个话我印象很深。他就告诉任仲夷跟我，说你们到广东去，广东的改革开放，是指全省都要改革开放，不单单是指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这个话，他是讲了两次。

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今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是经济特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代表团的团长。在特区建立10周年的时候，他来到了深圳。

（江泽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

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

但是，在特区创办初期，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到过那里的人反应也不尽相同。对新的试验，人们充满希望，当然也少不了忧虑。

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的专列悄悄地离开北京，去了南方。

（梁灵光）

小平同志这次的南巡，我称它为第一次南巡。这次的南巡，我们过去在报纸上、电台上、电视台上宣传报道得不够。因为有这么个情况，就是我们到广东来，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全国呢，对改革开放有的人赞成，有的人还不赞成。

（袁庚 原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局长）

另外还有人讲这个东西是不是新的洋务运动啊？把李鸿章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和今天联系起来，好像开放改革也是新的洋务运动，含沙射影，这样联系的。

（梁灵光）

那个时候，广东，我们来时压力很大，改革开放，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也有。风言风语很多。大家觉得压力很大，特别是 1982 年反走私紧急通知以后，压力很大。所以对特区搞得对不对，对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不对，也是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

（袁庚）

因此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人家都认为你怎么又要钱又要命，这个事情，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口号啊！我曾经问过很多同志，很多人都是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梁灵光）

所以他这次来，主要是来看一看，因为这个特区政策是他首创的，是他提出来的，究竟这个特区政策搞得好不好，这个政策行不行，他说我这次是出来看看，是深入到下层来看看。

（字幕：深圳）

特区到底特在哪里？当时，中央给予特区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特区建设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经济所有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结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和方便。正是在这样一个政策的驱动下。特区建设者艰苦开拓，使深圳这个原先只有两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几年之间便神奇般的发展起来了。

（刘田夫原中顾委委员）

（19）84 年，他亲自到了深圳，他们向他汇报，汇报特区建设的过程，汇报了 40 分钟，小平同志一句话也没说，他中间不插话的，一句话都没插过。到最后了，汇报完了，小平同志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因为汇报过程当中，就讲，他们有个想法，就想发行经济特区的货币。听完了之后，小平同志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说你们如果要发行特区货币，你们考虑过没有，特区货币会不会对人民币有什么冲击？

（梁灵光）

以后梁湘陪他到深圳的国商大厦，到了 54 层的大楼上到了楼顶上，他看到整个深圳新发展的情况。看到发展的那么迅速，他还是比较满意。但是，没有专门作讲话。当时他不大讲话，讲得不多。因为小平同志他当时看的東西，一般地不轻易表态。所以在没有考虑成熟之前，他都不发表意见，所以我们当时也理解这个情况。后来看了一个渔民村，三、四十户人家，原来是很贫困的，后来都富起来了，每家都盖了新房子。小平同志看了后很满意。后来又去看了个电子工厂，工厂人员介绍情况他也有些插话，我记得不很准了。

在这里，邓小平被有趣的电脑应用技术表演吸引住了，他听说电脑能和人下象棋，索性坐下对起阵来，原来安排的 15 分钟参观时间就这样又延长了半个小时。

（字幕：深圳迎宾馆桂园）

邓小平就住在这里。在这宁静的时刻，深圳人的心里却不平静。深圳在邓小平的心中究竟是一个什么印象，深圳人急切地期待着邓小平的声音。可他暂时没有表态。

（字幕：深圳湾）

远处，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片白色建筑群就是香港。镜头摇过来，海平线上隐约可见的那个城市是深圳。镜头再摇过来，这片建筑就是深圳著名的蛇口工业区。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一行就是从这里离开深圳乘船去了珠海。

（梁广大中共珠海市委书记）

因为珠海特区可以说从零起来，珠海当时没有什么商品，市场经济可以说不用说了，连集体经济也都不行。当时珠海整个财政的收入，都不够自己发工资。1984年初，小平同志来视察珠海经济特区，当时珠海这方面处在个探索的阶段，但是基本上已看到一个初步的轮廓，又盖了一批第三产业，建设的规模，也初步拉开。小平同志视察以后说，尽管认识不一致，但短短这几年，珠海能够拉开这个建设的局面，是不简单的，我很感兴趣，非常兴奋，看到整个珠海处在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所以他就亲自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当时对我们鼓舞很大，当时我记得还没有给深圳题词。

珠海人激动了。深圳人心里却在打鼓。然而，几天后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确实令深圳人兴奋不已。邓小平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是对深圳人的肯定！

这是对整个经济特区的肯定！

（字幕：1984年2月8日厦门）

离开广东，邓小平来到了厦门。他和王震等人乘坐游艇，在风和日丽的海面上围着厦门岛缓缓地绕行了好几圈。

厦门作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批准开发的时间比深圳、珠海晚一年，它的建设速度比广东那边慢一些。在诸多困难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作为一个海防城市，准备打仗的箭在弦上绷了几十年，现在搞对外开放，这个弯子自然要拐得大一点。

（邹尔君原厦门市市长）

小平同志1984年来的时候我向他汇报，我们比较慢，我们现在正在抓这些事情，他就讲了一句话，对头。中央是1980年批准的特区，到1981年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动工。那时我们心里很着急。因为深圳、珠海进展都很快，而我们还在同土打交道，同石头打交道，解决基础设施问题。

（陆自奋原中共厦门市书记）

真正的厦门动起来，开始动，是在1982年以后，这样在时间上隔的差距

就比较大了。小平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到厦门。

（邹尔君）

当时我最苦恼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特区大小，只有 2.5 平方公里，一眼就望穿了。我们向小平同志报告，要求扩大到全岛。第二个呢，在经济特区里边，赋予自由港的政策。当时小平同志，我向他汇报的时候，他点头微笑不答复，后来他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你的要求，我转告第一线的领导同志，让他们去作决定。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厦门人对他的这个题词有过不同的理解。

有人说是对厦门的批评，有人说是对厦门的鞭策，也有人说是他对整个特区试验的期望。

（中南海怀仁堂）

15 天后，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同政治局的其他常委谈了他这次南方之行的感受。

在特区的时候，他讲话不多。这一次，他讲了很多。

他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厦门特区划得大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首先吸引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就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我们要开发海南岛，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

根据邓小平 2 月 24 日的这次谈话，4 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邓小平）

搞这个开放啊，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领导。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有没有劲头的人……

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北自大连，南至北海的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这一建议。

（梁灵光）

所以我说，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不但肯定了我们的特区的政策，我们的改革开放，广东、福建的改革开放，而且，引起第一次我们沿海开放的高潮。

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

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政策，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

（邓小平）

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了以后，明朝衰落了。以后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也是邓小平敏锐观察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和科技发展的结果。他说：“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所以，对外开放政策是我们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世纪也不可能改变。

（字幕：山西平朔）

1984年，在山西省的北部，长城脚下，当时国内最大的合资企业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始破土动工。

合资方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哈默先生，他是邓小平的朋友。

1979年2月在休斯敦的一次聚会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哈默，别人要向他介绍，他说：不用介绍，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你在苏联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们，我们也欢迎你到中国来。哈默说：我很愿意，但是中国不让我的私人飞机降落。邓小平说：这很简单，你来之前来个电报。

后来，哈默真的坐着他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新闻播音）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董事长哈默博士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美国科威特公司代表团。

翻译：86了。

邓：86，你比我大六岁还多一点。

哈默：这是我的夫人。

邓：你好。

邓：这是一件好事情。

（新闻播音）

邓小平说，中美共同开发安太堡露天煤矿，是中国同外国达成的最大的合资协议，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最近决定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你们带了个好头。哈默说：由于邓主任的关心，使事情进展顺利，第一期工程建成后，原煤年产1500万吨。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奉行开放政策的结果，而且大家都赞成这种政策。哈默说：他将继续推进中美合作，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合资，今天看来已经司空见惯，可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这个字眼却是那么的陌生。

（李岚清国务院副总理）

1978 年底，当时我们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一个重型汽车的技术引进。在谈的过程当中，这个通用公司董事长莫非就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只能谈技术的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合资，这个英文的名词就叫 JOINT VENTURE。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语，但是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 JOINT VENTURE，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就是合资经营，当时他就给我们作了解释，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很有兴趣，也不失为一种可能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方式。但是我的思想立刻就有另外一种反应，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但是当时有一种制度，就是重大的项目的谈判，都随时向上面写简报。我们也写了简报，通过国务院的技术引进办公室向上报，谷牧同志当时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他就批示：拟同意。但是，同时就感到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就报送给中央政治局的所有领导。我们接到这个批示以后的简报，当时我们感到非常惊喜和兴奋。所有的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当时都圈阅了。小平同志特别的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经营也可以办嘛”。我这个印象是很深的。这个批示的日期是 1979 年 2 月 11 号。这件事情我们后来在学习小平文选时才知道在 1978 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有这个构想。而且在批示的前几天，他接见荣毅仁几位同志的时候，就谈到了在中国引进外资，搞合资企业。但是作为一个具体项目的正式批示，在我的回忆当中也可能是最早的一个。

合资，英文字面解释是共担风险，共享利益。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合资企业给我们提供了直接学习先进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的条件。

（邓小平）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

开放，不仅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活力。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NEW ' S）

今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发生了变化，对有些人来说，步子也许太快了。而对新一代的许多成员来说，还不够快。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并没有什么错。很显然，有不少个人是既为国家工作，也为他们自己工作，荣先生每天由司机驾驶奔驰车送他上班，他在公司的大厦里，管理和经营着企业的王国。许多高层领导都是他的朋友，据说他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他就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先生。除了他显而易见的财富和权力外，他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今天自己的生命已经贡献给社会主义。（荣）我不否认我曾经是一个大资本家，但那是解放前，现在那些工厂已不再属于我了，我在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1984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迎来了它的五周岁生日，为纪念它的创立，中信公司在北京召开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

（邓小平）

这么多国际的著名的企业家、金融家一块到北京来，体现了各位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关注，中国现在正在深化改革和开放……

邓小平对到会的专家、学者说：“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邓小平）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字幕：广州白云宾馆）

1985年的春节，邓小平又来到了广州，又一次登上了去年他曾经登临的这座高楼。

在他到广州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这个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召开的。会议纪要指出，要把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沿海开放区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促进本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带动内地。

（贾庆林北京市代市长、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福建在对外开放方面，现在已经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商投资区、旅游度假区以及内地山区的开发地区，这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格局了。

从1979年特区试验开始，逐步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直到全方位开放的大格局。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大跨越。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海南建省，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

海南人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的土壤上，以最大经济特区的形象，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热点。

一度因为把开发权转让给外国人而引起争论的海南“洋浦风波”，已经渐渐平息，那里的建设步伐却更加脚踏实地。

（毛志君海南省副省长）

开发洋浦，一共需要15年，头五年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主要进

行整个开发区的平整，现在已经完成 11 个平方公里，已经建成了一个电厂，装机容量是 31.55 万千瓦，建成了 2200 门的程控电话。小平同志听了有关开发洋浦的汇报以后，小平同志就有一个指示，就是有一个讲话，他就说，海南省委关于开发洋浦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

在中国开放的这块棋盘上，上海的浦东开发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黄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小平同志对上海非常关心，1988 年到 1994 年，他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

（1994 年春节）

邓小平：今天我来给你们拜个年吧嘛。

众人：给你拜年，向你致敬。

朱镕基：刘靖基同志，苏步青同志。

（黄菊）

1990 年，我记得是（小平同志）年初来的时候，他就特别关心浦东开发这件事。

（邓小平）

向英雄的上海市人民表示热烈的问候，节日快乐！（黄菊）

他就说了，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朱镕基）

我们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

（黄菊）

在他的关心下，1990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了开发、开放浦东的这个战略决策，同时，中央也宣布了，9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就是浦东开发。从那年开始，上海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我记得 1991 年底，他来看了上海，他就说起 1991 年初春节在上海的时候，他就说上海开发晚了，你们要努力啊！年底时候来看，上海有了点变化，他又殷切地希望我们，要三个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

吴邦国：刚才江泽民同志来电话，向你拜年，向你全家拜年。还向杨主席拜年，向杨主席全家拜年。

邓小平：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也给他拜年。

（黄菊）

1992 年初他来，刚好是在他视察南方，在广东走了一圈以后来到上海，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上海要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这样一个新的要求。那年呢，上海开始发展得快了，当年，1992 年，我们利用外资，一年超过前 12 年的总和，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的鼓舞下取得的。到了（19）93 年，他又来上海的时候，在春节，他又提出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他说上

海要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尽快建成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从 1920 年邓小平第一次到上海起，七十多年了，他看着这座城市在变化着。

（黄菊）

1994 年的春节，90 高龄的小平同志一到上海第一天就要看杨浦大桥，我说你刚到。第二天，到第三天，他说，一定要去。第一、第二天天气是好的，第三天天气是蒙蒙细雨，六级风了。一早 5 点多他就起来，8 点钟，我陪着他去。小平同志登上杨浦大桥非常高兴，他就说“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毛毛在边上，她说：40 年了，我还没听到作诗呢，小平同志就跟我说，我这不是诗，我这是内心的话。

第十集

为了和平

（字幕：北京京西宾馆）

1985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云集这里，出席军委扩大会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

邓小平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字幕：纽约联合国总部）

80年代，这里越来越忙碌。

面对变化、动荡的世界局势，各国的政治家们都在思考着，邓小平作出了新的判断。

（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出现了重要的、新的变化。我国那时已经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也正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客观上讲也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也都渴望世界能够和平和安宁。其次，在世界范围之内出现了一种新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高潮，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同时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极大地妨碍了、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家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南北差距在扩大，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小平同志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抓住了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

1985年3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汉斯·克莱因德国联邦议会副议长）

我认为邓小平这一论断是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邓小平具有让人们认识外界事物的能力。事实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因素是相互关联着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的和平得不到保障，那末就不会有明智的发展。战争只能带来痛苦、贫困和死亡。

细心的世界观察家们发现，从70年代末起，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

（秦基伟原国防部部长）

因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各方面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这样使我们军队也好，和其他的各个方面的工作，始终是处于一种临战状态。

（刘华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

小平同志在和平时期第一个大的贡献，就是对国际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判断世界大战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发生，所以对我们解放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了很大的转变，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建军。

（字幕： 1984年10月1日）

（秦基伟）

军委主席，庆祝建国35周年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你检阅。

1984年的国庆阅兵引人注目，天安门上的邓小平心里想的是什么？

（邓小平）

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

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减军备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把尖端武器的竞争由地球引向太空的时候，中国却单方面开始实施了宏大的裁军计划。

（迟浩田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我们军队的方向就是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大家知道1984、85年小平同志讲这个话讲得最多，突出地强调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我们的经济上不去，我们国家不能富强，人民的生活不能改善。因此军队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全局观念。按照这个要求，所以军队一系列的工作都有一个全局观念，贯穿于我们一切实践中，再一点就是注意质量建军，就是说我们军队的建设，数量和数量的关系优先考虑质量，走一条精兵之路。

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赞誉。

（瓦西里欧塞浦路斯前 总统）

我们相信这一行动是积极的。在当今世界我们应该强调停止军备。投资发展和平事业，创造条件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

（乌尔斯滕瑞典前首相）

维护和平是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也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当然，中国的作用十分重要，比其他国家都重要，因为中国如此之大，在亚大地区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萨尔内巴西前总统）

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了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正是一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的立场出发，邓小平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施密特联邦德国前总理）

毛泽东、邓小平都曾担心苏联可能发动战争，这种担心在 80 年代几乎消失，今天已完全没有了。所以，今天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的经济，这对中国是特别幸运的事情。

1985 年中国宣布裁军百万的时候，邓小平已成为世界风云人物。但 11 年前，他率中国代表团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西方的政治家们还在猜测，邓小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 1974 年的那次联大特别会议上，邓小平详尽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定立场。这是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又及时对中国的外交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决不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压力。

（邓小平）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反复向世界表明：我们坚决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不结盟，不对抗，不当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其中也包括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1972 年，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美两国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平坦。毛泽东预见到这一点，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

（柴泽民首任驻美大使）

尼克松在 1972 年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时候，就讲到，说是在我的第二任总统期间，我一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是以后由于“水门事件”，这个任务就没有实现。这以后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就职。当时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时候，他也讲，说在我第二届总统当选之后，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结果在竞选过程中失败了。所以卡特总统一就任，他就提出来，要在第一任，就是四年之内，要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朱启祯原外交部副部长）

70 年代后期，小平同志回到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以后，一直关心着对美国的工作。每当一个关键的时刻，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他都用他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方针政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小平同志不仅关心谈判进程，而且对每一轮的谈判都是给予一些具体的指示，甚至于在最后谈判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自己亲自三次会见了美国的谈判代表。

（柴泽民）

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就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太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这三个原则美国是接受了，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

（朱启祯）

当时如果要坚持美国要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了在那时的情况下和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来解决。因为有这句话，才有后来的“8.17”公报。这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内容，简单说来就是美国承诺逐步减少向台湾的武器销售，而且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超过建交时向台湾出售的水平，一直到最后完全停止。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8 天后，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

美国政府在白宫外面的草坪上，以隆重礼仪欢迎他的到来。

（邓小平）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二百多名新闻记者跟踪采访和报道了邓小平的活动。美国的一位新闻评论员说：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并富于幽默感，他使你不能不有所反应。可以毫不夸张他说，邓小平每到一处，都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在有名的国会山上，那些见惯世面的议员们，也纷纷拿着以邓

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留念。

在得克萨斯州竞技场，女骑手向邓小平赠送了一顶崭新的牛仔帽，邓小平高兴地戴在了头上。他的这个举动，赢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天，竞技场周围的牛仔帽生意大为兴隆，成百上千顶牛仔帽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在 1979 年 1 月 29 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么一段：“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后，邓小平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他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小演员，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

从这以后，邓小平一直是美国各界，特别是新闻界关注的对象。《成功》杂志选他为 1985 年的成功者，《世界报》在 1988 年把他评为 10 年来最代表时代精神的名 222 人，《时代》周刊曾经两度把邓小平评为新闻人物。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中，最幸运的，要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它的“60 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1986 年 9 月 2 日，华莱士对邓小平进行了独家电视采访。

（华莱士采访邓小平）

华莱士：主任先生，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对你和对中国发表了谈话，他在谈话中说，让我们做好朋友，让我们结束我们之间的紧张局势，苏联准备在中苏边界减少苏联的驻军，使中苏边界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联系，而不是我们之间的障碍，你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和平建议是怎么看的？

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是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内部究竟对中国政策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你以前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没有。

华莱士：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你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邓小平：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 82 了，我老早就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是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刘述卿外交学会会长）

在 1982 年下半年，小平同志派了专人前往莫斯科传递信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争取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小平同志的决策和推动，所以从 1982 年 10 月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派出了特使，就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举行了长达六年，一共 12 轮的磋商。

一时间，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随着两国高级官员的互访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逐渐消除，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戈尔巴乔夫。这是自1959年以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在这次会晤中，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发展两国正常化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

为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正常化，祝贺这个正常化，大家干杯。

（刘述卿）

小平同志为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尽管后来苏联解体了，那么我们同俄罗斯，同其他的独立的共和国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长达20年的紧张对峙结束了，七千多公里边界线上的人们又恢复了友好往来。

（齐怀远对外友协会长）

我认为小平同志在外交上最关心的莫过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那么处理好周边关系自然也是很重要了。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新产生的问题。发生过磨擦、冲突，也有过战争。在小平同志外交思想的指导之下，这些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

为了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邓小平主张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计较历史恩怨，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1978年10月，他访问日本，前去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这在当时是中日两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双方约定，邓小平这次访日，不讨论诸如钓鱼岛归属那样的有争议的问题。

但在东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日本记者却依然向邓小平提出了钓鱼岛的问题。

（邓小平）

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就有叫法不同。这点双方确实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样的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也约定，不涉及。就中国人的智慧来说，也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倒是有些人想利用这些问题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两国政府谈这些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你摆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邓小平巧妙地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思想在他的脑子里开始酝酿：解决国际争端，应该按照时代的特点提出新办法，使之不要

成为爆发点，可不可以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里的资源？

（齐怀远）

后来小平同志就把这个思想延伸引用到南沙群岛问题。在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小平同志结合“一国两制”，就把共同开发的思想比较完整地提出来了。他当时说：处理国际问题要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办法。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上就把它划到中国，是属于中国的。现在除了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那么将来怎么办呢？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用武力把这些岛屿统统收回来，另一个办法就是搁置主权问题，共同开发。这样就可以消除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世界上这类问题还不少，我们中国是主张和平的，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争端。小平同志说他这个思想，外宾听了都感觉到很新鲜，很有意思。现在中国同东盟国家，同印支国家的关系发展都很好。

（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

我昨天晚上赶回北京，专门欢迎阁下。我们两国都在差不多同时政府换了届，中国完成了这个事情，日本也完成了这个事情。我是换下来的，所以我很悠闲地在海上活动。我因为是热心于中日友好合作的一个人，所以你来，我也非常热烈地欢迎你，这种热情欢迎，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新型的，不低于田中（首相）、大平（首相）时代的新的关系。

（1988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

就是退休了，你来，我还会、也应该见你。这不但是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也有一种特殊的亲戚关系，我们中间有一些疙瘩，不难解开。

（1989年3月17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差猜）

欢迎你。

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典范。好是真好，不是假好。国际关系还是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双方关系的标准。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甘地）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要恢复我们的友谊，成为好的朋友，国家的朋友，人民的朋友，领导人之间的朋友。中间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提出了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从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敏锐地顶见到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为首的两极国际政治格局行将结束。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邓小平对拉·甘他说：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应当用它们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还说，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南北差距还是在扩大。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突变。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不久，又出现了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

（国际新闻）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昨天宣布辞职，在回顾他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近七年来的经历时，他承认这些年来进行的种种改革都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结束后，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悄然降下。

（字幕：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

世界注视着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面临着考验。

（钱其琛）

当时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只要自己的事情办好了以后，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很从容地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要有数。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

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中国，中美关系由此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朱启祯）

在这样情况之下，也是小平同志出来掌舵，确定当时对美国的一个总方针。一个方面就是对美国方面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遵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且这个原则都在双方公报中间表明了，所以中国绝对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另外一个思想是我们绝对不会乞求美国来取消制裁。因此中美关系的改善应该由美国采取主动，如果我们要乞求美国取消制裁，我们中国就站不住，我们就要丧失我们的国格。第三个思想就是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都要首先考虑到自己本国的战略利益，同时要尊重对方利益，而不应该让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来干扰两国之间的关系。

1989年10月和12月，美国相继派出了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访问中国。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们。

邓小平告诉尼克松，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政府采取主动。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邓小平：欢迎你，欢迎你，非常高兴看到你，欢迎你作为布什总统的特使到这里来。应该对此表示感谢。

斯考克罗夫特：非常感谢。

邓小平：你这个行动是个很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中美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分歧，归根到底，中美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西方的制裁，这位老人从容而有力地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他说，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我们自己要提高警惕，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少数几个国家要垄断世界，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霸权主义、强权主义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20 世纪就要过去了。世界历史进入向新格局过渡的艰难行程。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们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1995 年 5 月 9 日，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聚集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

（江泽民）

站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纪念馆面前，历史的画卷令人激动。

历史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侵略扩张导致灾难，和平发展才能带来繁荣。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世界和平的明媚阳光之下，人类崇高而远大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第十一集

心系统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至今还有三块地方由于历史的和人为的原因，与祖国大陆隔开了。它们是台湾、香港和澳门。

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实现祖国统一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心愿。

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书房里遗憾地告诉英国首相希思：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又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

几年后，邓小平说，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

198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

这里面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炎黄子孙都希望祖国能够统一，分裂状况总是违背民族的意志的。其次，就是台湾，只要台湾一天不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得不到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

美国有种舆论，就是说中国统一的问题，台湾问题，台湾归还祖国的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50年代，麦克阿瑟和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计划，一道海峡成为隔绝两岸人民的鸿沟。台湾和大陆的统一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954年12月2日，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当局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政府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用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下，我人民解放军从50年代开始相继解放沿海岛屿。但独独留下了离大陆最近的马祖列岛、金门岛和大担、二担岛没有解放。

这在当时是一个谜。

（叶飞原福州军区政委）

开始我们也想不到，思想也不通，不光我们思想不通，连彭德怀思想都不通，彭老总呵，彭老总是想解放金门的，他是很积极的，我们思想都不通，后来为什么通了呢？毛主席明讲了嘛，后来毛主席就明讲了，绞索政策，金门、马祖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这绞索美国自己要解开都解不开，为什么我们来替他解开呢？因为一解放，这绞索不是就没有了吗？

1972年2月，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走进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在这次改变中美两国关系的访华活动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反复筹划着如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自己实际提出来的，中国自己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个用谈判方式，一个用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谈判的双方、或者三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是三方。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台湾能够接受，美国也能够接受。

（林丽蕴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

听到这段话呢，我自己作为台湾同胞，当时感受特别深，我们当时是说，要解放台湾，那台湾就是实行跟大陆一样的制度，是这么来理解的。从台湾同胞来讲，作为炎黄子孙，认同自己的祖籍，自己的根，这点是没问题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中国，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毕竟长期的几十年来的隔绝造成的那种对大陆的制度的不理解，或者甚至是疑虑，甚至可以说是还有一些反对的想法来讲，他们也还是有些担心的，到底统一了以后会怎么样？那么很明确他讲到，统一了以后，不会把大陆制定的政策拿到台湾去使用。我想这个可以说是为和平统一的前景，从政策思想上提出来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

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政协全国委员会当天座谈讨论，邓小平在会上说，今天有三个特点：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提上具体日程。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邓小平后来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细谈到了大陆和台湾统一的六条设想。这就是海内外广为传颂的“邓六条”。

（汪道涵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一个名词没有，叫“叶九条，邓六条”，现在基本上按照他们两位，特别是“邓六条”的精神来处理两岸的关系。这两个文告发表后，台湾有所震动，台湾（方面）也是基于他的考虑，就是两岸对立、对峙的状态，是不是要有所改善？因为大陆已经表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这样的精神，他们就开始要缓解两岸关系。

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宣布允许在台人员赴大陆探亲。当年少小离家的游子，在饱经了几十年的离愁别绪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资料片）

你就是焕民？我是周东柏！

太久了，真是太久了！

（王兆国原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我们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特别行政区仍然坚持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国两制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是别的国家提出来的，是我们中国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实行一国两制。

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小平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国情，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对于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在国际上解决长期遗留的复杂问题也是一个出路。

（唐树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15年来，在邓小平同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指引下，两岸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两岸从紧张的军事对峙转向了缓和。

第二，就是17年来，两岸人员的交往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不论是新闻、科技、学术、体育、文艺各方面的交流都得到开展。这样的一种交流明显地增加两岸同胞的了解，增加了两岸同胞兄弟的感情。

第三，就是两岸之间经济的交流有了广泛的发展，两岸已经初步形成了互补互利的局面。这种经济上密切的联系，将一定会为和平统一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从1988年开始，海峡两岸龙的传人，每年的大年三十都在昔日对峙的厦门和金门，同时燃放烟花，共贺新年来临。五彩缤纷的焰火，点亮了两岸寂静的夜空，带来了一片祥和的气氛。

可是，在这种祥和的背后，台湾岛内仍有一股势力，鼓吹台湾独立，破坏祖国统一。

邓小平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提醒人们：解决台湾问题，要有两手准备。

（邓小平）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

放弃国家统一？但是，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的精力要花在国内建设上，那个事情晚解决几天无伤大局。但是，不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第三梯队的人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王兆国）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始终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承诺不用非和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就是说，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理解这决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是针对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

199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作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八点重要看法和主张。他强调：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江泽民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他说：“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创造者。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论断和思想，确立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指导方针。”

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和大陆靠得更近。邓小平早年曾五次去过那里。1920年9月，他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途中第一次经过香港，以后，从1929年到1931年的三年中，他因从事革命活动的需要，在往返苏区和上海中央的途中，曾四次到过香港。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原属广东省宝安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60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再趁列强瓜分中国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

我国政府一贯立场是：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的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候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

（鲁平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

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我们作为中国人，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收回香港和澳门是我们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夙愿。我们祖祖辈辈世代代，都为此目标进行了奋斗，而且很多爱国志士为此抛头颅，捐身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我们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而且宣布，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因为随着1997年的来临，新界租约很快就要满期了，所以英国政府不断地想来试探我们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和态度。到了1979年，那个时候我们“港澳办”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了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来，小平同志见了。当时他跟麦理浩就讲，我们把香港一直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也充分考虑了香港它的特殊地位，所以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怎么样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是肯定会得到保证的。说得明确一点，他老人家说，就是在这

个世纪，以至于下个世纪初期，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香港还是可以继续实行它的资本主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这点他请投资者放心，所以当时他已经提出来了“一国两制”这个构想。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中国访问。邓小平向她阐述了为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当时，英国方面又在想什么呢？

（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前首相）

我们要商谈顺利交接，协助一手建立成功的殖民地、出色金融生产中心的香港人和中方磋商，让资本主义香港可继续行使我们的法律。

（周南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英国人并不想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他们当时的如意算盘，按照撒切尔夫人第一次来，1982年，同小平同志会谈当中，她开始还是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这个我们当然理所当然地驳斥了她。后来她又想用所谓治权，主权换治权，就是说名义上主权交还给中国，但是要英国继续管理。如果中国方面要提出把香港收回，由中国人来管理，她说香港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来吓唬我们。当时小平同志严正地驳斥了这种荒谬的说法。

（邓小平）

我跟她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说中国1997年收回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不管用什么方式。接着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说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是在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受主权的条件。

当时我说，不排除这个期间发生意外的事情，香港发生动乱。再一个是我们根本谈不拢。我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玛格丽特·撒切尔）我当然想说，或者是有租约，但是否应让香港人自决？但中方断然否定，收复主权对我们和人民很重要，这是尊严的问题。我们关心的不只是领土问题，还有当地人民的意愿，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很重，必须归还中国，因此我很失望。

此后，中英双方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谈判。22个回合的较量波澜迭起。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姬鹏飞 原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比如驻军问题吵了好久，驻军问题是驻不驻啊？他们说你们不驻好了，我们说一定要驻军，不是在报纸上人家公开了吗？说是不驻军，有些人不是不主张驻军吗？所以小平同志就拍了桌子，召集香港的代表来谈谈。香港不驻军，我们怎么体现收回香港？香港要象征性地驻军。香港收回来了，驻军

是我们主权的表现，不驻军就是表明我们没有收回（香港）。

邓小平这几句话，字字千斤，一锤定音。

（周南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中英谈判之所以能谈成，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我们国家是强大的，从 1949 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强，同 1840 年不可同日而语。过去有一句成语叫“弱国无外交”。这次谈判之所以能谈成，是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是个有力量的国家，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其次，能够谈成是由于谈判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来谈的，也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方针或者叫战略搞对了。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在谈判结束时说，“一国两制”的方针要归功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资料片解说）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于 1984 年 12 月 18 日乘专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并签署联合声明。同一天，应邀参加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观礼的 101 位香港各界人士也从香港来到北京。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

在会见时，邓小平说，中英之间的阴影现在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撒切尔夫人赞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创造，是行得通的。

采访正式签字仪式的一百多名北京、香港和英国的记者，这一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直播签字仪式的实况。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5 时 30 分，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字。

这是个庄严的时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香港问题上蒙受的屈辱，终于有结束的日期了。

香港新闻媒介都争先报道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消息，世界各国舆论都盛赞中英联合声明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榜样。香港各界，更为之振奋。

（霍英东 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 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在北京签署声明，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大日子，也是中国现代史一个大日子。

（曾宪梓 全国人大常委）

最根本的一点，值得我们香港同胞兴高采烈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两国政府一致同意了，就是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我们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必须在同一天把香港交还给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整个香港都轰动起来。

（费彝民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原香港大公报社社长）

香港主权收回呢，我在香港呆了三十七年半，也就是我等了三十七年半了。我特别是欣赏“一国两制”的创意。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解决办法，不但

是对香港适用，对台湾适用，将来国际间慢慢地也要作为榜样，在历史上有地位。第二，我个人呢觉得高兴，我跟香港人一样，香港人今后照现在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应该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只有满意的地方。

（查济民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

今天到了中英联合声明 10 周年了，我们会看得出来，“一国两制”这个办法，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想法，现在已经得到证实，是有效的，是对我们中国最大贡献的一个政策。

1985 年 4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英联合声明。过渡时期的香港并不平静。邓小平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实现平稳过渡。不论什么人在香港问题上制造什么麻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有决心、有能力按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为了确保（19）97 年之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同时，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也立即展开，目的是把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基本法的原则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还说：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没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

1990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决定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

（平塔席戈尔 葡萄牙前首相）

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我们都很感兴趣，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不可能完全分开。但是，我必须赞赏中国政府的理解和所做出的努力。葡萄牙宪法中明确表明，澳门是中国领土，我们从未把澳门当作葡萄牙殖民地，那是中国领土，葡萄牙的人民在一段时期可以在那里和中国人民相处。

我们将于 1999 年结束对澳门的统治管辖。

1987 年 4 月 13 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

澳门总督发表谈话

（韦启立 澳门总督）

他说，《基本法》是中葡两国签署联合声明的成果，澳门将会在有信心、有发展的气氛中平稳过渡，而且澳门管辖权的移交也将会顺利进行。相信澳门居民会充满信心和安全感地渡过过渡期，澳门的前途是光明的。

1987 年 4 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这一年，他 83 岁。

（邓小平）

我快 83 了，到今年 8 月就 83 岁了。

要体现这个“根本法”。这个“根本法”也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示范，所以这个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法，世界上、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法，是件新事物啊，再花三年时间把它搞得非常妥当，我相信我还看得到。

1990 年 1 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这一年，他 85 岁。

李嘉诚：你身体还非常好。

邓小平：毕竟 85 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嘉诚：希望你创造一个纪录。

邓小平：我自己是争取活到 1997 年。

李嘉诚：我敢买保险，你能超过这个。

邓小平：一年比一年困难了。

李嘉诚：希望你能够到香港来看看。

邓小平：我活到 1997 年，就是要在 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李嘉诚：一定会的。

李嘉诚先生问起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邓小平说：

（邓小平）

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就是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1992 年 1 月 20 日，在深圳国贸中心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里，邓小平深情地望着香港，那是他五次去过的地方。这一年，他 88 岁。他心里要说的，也就是他多次表达过的，我要活到 1997 年，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到香港去看一看，哪怕坐着轮椅也要到这块中国的土地上走一走。

我们在制作本片时，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未来的繁荣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已进入了倒计时。

香港各界同胞欢欣鼓舞，做着各种准备，迎接香港回归祖国。

第十二集

晚年惜怀

1989年11月9日，新闻媒介向全国播发了一条重要新闻。

现在播送邓小平同志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播音逐渐消失）

这天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同志们道别。

（邓小平）

“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邓小平身体力行，推动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是他领导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

（李鹏 国务院总理）

我是1981年担任电力部的部长，当时可以说在中国的政坛上还是引起了一番轰动，因为算是最年轻的吧。当时我们原来的老部长刘澜波同志推荐我，当时我才51岁，算是相对年轻了。小平同志在一次宣布这件事情的会议上，他曾经表扬了刘澜波同志是开明人士，党内的开明人士。因为当时在我们党内风气还是排资论辈的，比我资格老的还有很多。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的同志当时在电力部还有好几位，如果是论资排辈，排不上我。所以小平同志在于部大会上，我记不得了，好像是“七一”的大会上，还是在这前后，他公开表扬了刘澜波同志为开明人士，是我们党内的开明人士。

李鹏总理介绍的这个情节，我们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一文里可以看到。

（李鹏）

从这个具体的事情，就说明当时他已经看出来干部要年轻化，是高瞻远瞩的，考虑到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逐渐逐渐地，经过小平同志的提倡，干部的四化逐渐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制度，我想这是保证我们事业能够一代代相传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步骤。

实现党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是邓小平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反复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党的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关键在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说，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同志，第二代领导集体“我算是个领班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大家都要维护这个核心，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这是我的政治交待。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结束三天后，邓小平与新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道，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

（邓小平）

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我们军队在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军队更多更大的贡献。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会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谢谢大家！

离开了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的邓小平，过着恬静的退休生活。他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记述了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聂卫平 中国围棋队教练）

小平同志退休以后他的桥牌水平没有下降，他自己多次在打牌的时候跟我们也讲过，他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呢，说明我脑子还行”。他有一个可能是我永生难忘的表情，就是他一笑啊，虽然咱们说是像慈祥的老人，但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很天真幼稚的孩子似的，笑得非常的天真和纯。对这位老人来说，退休后个人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戒掉了抽烟。这是伴随了他几十年的习惯。邓小平嗜好抽烟，并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1988年，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他们的谈话就是从抽烟开始的。

（邓小平会见阿基诺夫人）

邓小平：我抽烟啦。

阿基诺夫人：我不能对您说不能抽，因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在菲律宾，我们内阁开会，不许抽烟。

邓小平：这次人大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起一支烟来，就有一个代表递条子，提出批评，马上只好接受，没有办法。

为了他的健康，人们曾为他特制过一种香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向他要过这种烟。

（邓小平会见华莱士）

邓小平：我抽烟可以吧？

华莱士：当然可以，我也抽一根，谢谢！

邓小平：我这个是他们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这么长。

华莱士：过滤嘴长啊，比烟还长。

可以想象，这位老人在戒烟时作出了多大的努力。

退休后的邓小平，希望像普通人一样上街走一走，看一看。1990年7月，他来到了亚运村。

邓小平退休了，但正像他一直关注着世界一样，世界也关注着他，来中国访问的新老朋友们，都希望能见到他。

1989年12月1日，他会见了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促会访华团。

邓小平对樱内义雄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的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5个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了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1990年5月13日，他会见了老朋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穆巴拉克：非常高兴能够见到您，您是我的老朋友啦，我每次来必须要见到您。

邓小平：我们个人之间是老朋友，前两天香港报纸说我已经“不在了”，我很高兴你见到的是一个活人。我耳朵不行，所以我还带了个耳朵来，这是我女儿。

穆巴拉克：我看到您身体健康，我也很高兴，祝您长寿。

邓小平：谢谢，本来我已经退休了，不再见客人了，但是个别的老朋友不见也不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退休后的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他。

（新闻资料解说）

邓小平告诉基辛格，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会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博士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但还是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嘛！基辛格说，您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您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您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个政治家之一。您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两人还愉快地回忆了他们相识多年来的友好交往。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现代化建设路子怎么走，持续十多年的改革怎样深化下去，中国能不能把握住世纪之交大发展的良好机遇。这些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孙尚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时候，经济的发展中间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物价上涨的幅度过高，物价上涨幅度过高对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还有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所以中央及时提出要进行治理整顿，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能进入一种良性发展的循环，走上持续的快速的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国际方面来看呢，那个时候，就是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心明显地向亚太地区转移，特别是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而我们中国呢，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和西方那种衰退成为鲜明对比的这种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当时的国际经济和国内治理整顿以后的经济态势来看，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那么当时谁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呢？

1992 年 1 月，邓小平像往年那样，去了南方。

（谢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1992 年，他在 1 月 19 日到广东来视察，他多年没有来了，大概距离上一次是 8 年时间。他是 1984 年来过，这次来是八年后来。大家知道了小平同志要来，是非常高兴的。我就觉得小平同志是急着要了解情况，急着要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变化，这一点印象很深了。因为原来没有这个安排，就是要休息一下嘛，然后再按计划一步步来。可他改变了，马上就要看。

（邓小平参观实况）

邓小平：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

陪同：不会，不会，你放心。

（谢非）

在深圳参观，然后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他看的过程，他一边看就一边谈，他不是在一个时间谈，他整个进程都谈。他这个谈话不像老人的谈话，没有废话，没有重复的话，思维非常敏捷，语言非常准确，深入浅出，很精辟。

（邓小平）

（介绍：现在这个产品已经进入国际市场）好，出把力，依靠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要摆脱落后和被人欺负的局面。

所有出国去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过去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回来妥善地安排。他们能够做出贡献，只有回国，起码国内相信他们，在外国真正相信他们是靠不住的。

我是看新鲜，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高越新我越高兴。我高兴，人民高兴，还有中国这个国家高兴。要发达起来，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多年了，几百年吧，我们才多长时间？我们尤其是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相貌完全不同了，再耽误不得了。

手软不得，我也是在广州时谈到人有两只手，这是毛主席的话。毛主席

经常讲的。两只都硬，两只手不是一只手，是两只手。一只手改革开放，一只手严厉地对待那些坏东西，毫不手软。两只手都要硬，软一点都不行，软一点都搞不起来。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要开啊，开放了信息才灵通。

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邓小平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他还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

离开深圳前，88岁的邓小平在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四季长青的高山榕。他是“全民植树，绿化祖国”的倡导者。从1979年开始，新中国有了植树节，那一年的3月12日，邓小平在京郊大兴县庞各庄种下了一棵树。此后，每年的植树节，他都要参加植树活动。而这次在深圳种下的高山榕，外电评论，它所象征的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植树本身。

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即以1992年2号文件向全党作了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一致认为邓小平的谈话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丁关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关键时刻视察南方，作了重要的谈话。谈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谈话科学地、精辟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对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科学分析和深刻的总结。这次谈话给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以巨大的推动，也为开好党的十四大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同党的七大一样，这次大会在我们党的旗帜上又书写了崭新的内容。

10年前，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命题。

（邓小平）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二大以后，经过党的十三大，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到 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历史性决定。

（江泽民）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好用好。不仅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更要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江泽民）

14 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丁关根）

1993 年 11 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三卷的出版对落实十四大提出的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过程中，小平同志以 89 岁的高龄亲自审定了全部文稿，体现了小平同志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文选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记载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历程，凝结着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心血和卓越的智慧。

学习小平同志的这部著作，我们感到非常的亲切，他在果断的决策中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在朴实的语言中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小平同志的理论非常正确，确实确实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

《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出版，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

与此同时，各种文字和版本的邓小平文选，以及介绍邓小平生平业绩的书籍也在世界各国发行，世界舆论高度评价邓小平。

（卡拉汉 英国前首相）

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阅读有关著作，注视着中国的一切。他（邓小平）经历了中国国内那么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并且幸存下来了。他领导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物质上的收获。通过几次对华访问，我看到中国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

（平塔席戈尔 葡萄牙前首相）

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许多不同时期的人。他拥有极大的勇气，他使中国改革开放跟随世界潮流。

（麦克纳马拉 世界银行前行长）

邓小平知识渊博，富有远见，他清楚他想要中国走向何方。他拥有一种情感，我认为这种情感十分重要。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依赖于中国人民和中国自己的领导人。他说外援是好的，我们需要，但他不管是否有外援都决心达到自己的目标。他的这种依赖自身、自己国家、自己的资源、自己的人民的意愿是至关重要的，是你们成功的根本。

（特鲁多 加拿大前总理）

他是个革新者，他想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如指掌，他总是强调稳定的必要性，他知道开放市场会导致一些不稳定，但他是个实干的政治家，他对中国的爱和想看到中国发达强盛的愿望从未动摇过。

（索尔萨 芬兰前首相）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邓小平即使不能被誉为中国唯一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因此，他也是世界最具历史意义的领导人之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就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接受了我们摄制组的采访。

（江泽民）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几年来，邓小平同志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建树的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解决了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从而建立了两个伟大的历史功绩，这就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成功地找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新的重大贡献，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1994年10月1日，共和国迎来45岁生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晚会。在这动情之夜，邓小平没有出席晚会，他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地方和家人一起观看了北京城上空怒放的焰火，这时，他刚刚度过90岁的生日。

邓小平 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一个叫牌坊村的地

方。

这位几乎与整个 20 世纪同行的老人，在退休之前深情地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字幕）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创作人员名单

出品人 逢先知 杨伟光
总撰稿 冷 溶 陈 晋
总编导 刘效礼
执行总编导 汪 恒 赵群力
总摄像 赵立信
音乐音响总设计 包布和
总资料 阴建白
动画设计 王酉年
艺术顾问 庄 唯
制片主任 张 华 段树诚
编 导 诸嘉华 徐海婴
 王酉年 华 越
撰 稿 龙平平 刘金田
 高 屹 王 宁
 张爱茹 宋毅军
摄 像 赵 阳 郭志成
航 拍 赵群力 王荣春
录 音 王 爽 谷 文
音乐编辑 宋 力 包布和
解 说 赵忠祥
主题歌作词 叶旭全 蒋开儒
主题歌作曲 王佑贵
作 曲 艾立群 李海晖
 张红光 王佑贵
演 奏 中央乐团
指 挥 谭利华
电脑音乐制作 艾立群
制 片 顾建培 吴少京
 刘雪荣
外事记者 杨培英 姜 红
 周 勇
资 料 张爱茹 秦芝莲
 冯 玮 柏淑兰
 左来华 马英魁
技术主任 李晓明 李福利
技 术 杨少波 孔小白
动画制作 叶 庆 连漓村
 李 靖 恽小青
字 幕 王 林 韩 冰
 唐建荣
工作人员 沈国银 马金路
 张 静 宋玉洁

	刘芳莲	张家权
	裴 淑	英王萍
	崔毅岩	程姗姗
	王树进	王二龙
制 片 人	李东生	张 宁
	刘长乐	
监 制	何静修	沈 纪
	潘荣庭	汪作玲
	周立平	贾文增
	许二春	

